

上古韻部的界說與分部依據 ——兼論元音構擬的原則

姚榮松*

摘 要

本文藉由釐清上古韻部是否等同「韻攝」或北方曲藝押韻的「十三轍」，探討自1989年以來出版的有關上古音的6元音系統的新時期三家，標榜將傳統22—31的古韻部，一分為二或三，離析出53-58個韻母類型，以各式韻尾和6元音搭配成整齊的韻母組合結構表。打破王力、李方桂等「一部一元音」的韻母架構，是否為合乎押韻與諧聲的基本原則。全文分八節。首揭何大安（Ho 2016）對白一平、沙加爾（Baxter & Sagart 2014）新著《上古音新構擬》（暫譯）之介紹及潘悟雲（2010）有關上古音三派之形成。繼以龔煌城（2002）對潘悟雲、馮蒸元音構擬的批評、陳新雄對鄭張尚芳六元音及古韻58韻部之質疑與鄭張的答詢。再從何大安評白、沙新著的「一部多音」之誤，看上古韻部的界說與普世的詩韻正統；回歸到王力的「古韻分部」界說與押韻、諧聲系統不可偏廢的音韻學傳統。後二節以北大中文系上古音小組對白、沙「構擬新論」討論成果：程悅等三文考察文獻內證材料，提出宵、藥；微文物：歌月元不能再分部的驗證結果。最後從各家6元音共識的理論依據：白一平〈關於上

2020.02.04 收稿，2020.03.19 修訂稿收件，2020.03.27 通過刊登。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退休教授

古音的四個假設〉出發，歸結於其統整前人學說有功，尚未面對世人質疑，未必立於不敗之地。

關鍵詞：漢語上古音、韻部、十三轍、六元音系統、一部多音、宵藥分部

一、當代新起三家上古音簡介

何大安 (Ho 2016) Such error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 Review of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by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一文開頭即指出：

漢語上古音的研究，在過去三四十年當中，有著飛躍般的進展。這主要得力於理論和方法學的進步，以及相關語料的擴大。學者們對於這項研究的期待，已經不僅止於單純音韻的構擬，而是要更進一步，一方面積極探索與親屬語言或鄰近語言的歷史關係，一方面重建上古漢語的構詞學。從西元 2000 年以來，至少有五部關於上古音體系的專書出版，成果豐碩。在這些專書中，白一平、沙加爾 (Baxter & Sagart 2014) 的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以下暫稱《上古音新構擬》) 最晚出，在這兩方面所提供的資料也最為多樣，引人注目。¹

何文在小注中指出的五部專書，其實只有四家上古音系，依照出版之年份排列如下：

1. 白一平、沙加爾系統 (Baxter & Sagart 2014)，簡稱白—沙系統。
2. 金理新系統，包括下列二書 (2002) 《上古漢語音系》(黃山書社)、(2013) 《上古音略》(黃山書社)。
3. 鄭張尚芳 (2003、2013) 《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4. 許思萊 (Axel Schuessler) (2007) *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¹ 據何大安 (Ho 2016) 中文稿本。又據廣州中山大學馬坤教授 2018 年 7 月告知：白、沙新著中譯本《上古漢語新構擬》，已由來國龍、鄭偉、王弘治合譯完成。書名與何大安暫譯名相近。

爲全面回顧相關的上古音系，我們再列出 1989 年以後出現的六元音上古音著作：

5. 斯·阿·斯塔羅斯金 (1989)《古代漢語音系的構擬》(林海鷹、王沖譯，鄭張尚芳、馮蒸審校，2010 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又譯作《古漢語音系的構擬》(張興亞譯，唐作藩審定，2012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此書作者中文名字末字作「京」)。
6. 白一平 (Baxter 1992)《上古音手冊》(*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7. 沙加爾 (Sagart 1999)，龔群虎譯 (2004)《上古漢語詞根》(上海教育出版社)。

以上九部書，分隸五個作者群：

1. 白一平 (Baxter 1992)，沙加爾 (Sagart 1999)，白、沙 (Baxter & Sagart 2014)，可稱白、沙系。
2. 鄭張尚芳 (2003、2013)，另潘悟雲 (2000)《漢語歷史音韻學》，可稱鄭、潘系。
3. 斯塔羅斯金 (1989)。斯氏為雅洪托夫之弟子。
4. 金理新 (2002、2013)。金氏為潘悟雲之弟子。
5. 許思萊 (Schuessler 2007)。美國學者，書名可譯作《上古漢語同源詞入門詞典》。

以上五派，以前三系較知名，其論述已引起學界注意，金理新異軍突起，可視爲鄭、潘體系的支系。許思萊尚未受國內同行關注，爲了方便，本文以前三家系統爲主，後兩家從略。

關於三系的形成過程，潘悟雲 (2010: 3、5) 有三段分別的介紹：

(一) 1979 年，經梅祖麟先生推介，我仔細研讀了包擬古先生的大作《原始漢語與漢藏語》，當時十分驚訝又相當振奮。「文革」期間，我跟從鄭張尚芳先生研究漢語上古音，所得之框架與此書結論竟然如此相似。此後，俄羅斯的斯塔羅斯金先生也得出近似的結論，這就是有名的上古漢語六元音系統。三家學者、分居三地，研究結果竟然不謀而合，這說明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已日趨成熟。1980 年，梅先生建議由我翻譯此書。1983 年包擬古先生專程來上海和我討論翻譯計畫，自那以後，我們開始了長期的書信來往，不僅討論翻譯問題，也討論上古音的構擬。包擬古先生是漢藏語言學大師，藉此良機，受他指導，真是我一生的幸運。

(二) 在我認識的作者中，最後提到白一平與沙加爾先生，是因為他們的上古漢語體系反映西方此類研究的最高水平。如果說，包擬古先生通過漢藏比較提出他的上古音構擬，白一平先生則通過他數學家的頭腦，使之成為一個體系：由他們師徒倆共同命名的包—白體系。沙加爾先生的最大貢獻，是發現了漢藏語與南島語的發生學關係，這個發現，把東亞語言的研究直接與分子人類學的研究相關聯，使得東亞語言的同源與東亞人群的同源相互印證。此外，他還致力於上古漢語的形態研究，這是下一代漢語音韻學的重要內容。近年來，白一平先生和沙加爾先生合作，在以往的基礎上對上古漢語研究提出了許多新的想法，故合稱為白一平—沙加爾體系。

(三) 2002 年在巴黎，沙加爾先生向我提出召開上古漢語構擬國際研討會的建議，他說：「白一平—沙加爾體系」、「斯塔羅斯金體系」與「鄭張—潘體系」，有許多共同點：六元音、以母來源為 *l-，來母來源為 *-r-，去聲來源為 *-s，三等顎介音後起，二等與重紐三等來源為 *Cr-，等等。我們應該加強合作，使這些共識為更多的人所接受。2005 年沙先生倡導這個會議由復旦大學、法國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密西根大學、上海師範大學聯合召開，白一平、沙加爾兩位先生特地提前一個星期蒞臨上海。白、

沙二人為一方，我與鄭張先生為另一方，就我們兩派的分歧爭論了一個星期。既是朋友，又是對手，這是學術的魅力，也是學術的美麗。

根據這篇序文，建立這三派共同的元音系統的背後，有不少重要里程碑的代表人物，例如：包擬古、蒲立本、羅傑瑞、雅洪托夫、奧德里古爾等。三派的構擬在元音上建立六元音的共識，這是任何時期上古音難得有的共識，似乎開啓了上古元音系統的新紀元。很可惜，這個六元音系統並非兩岸學者的共識，深通漢藏語比較語言學的龔煌城院士，始終相信李方桂先生四個單元音系統最能解釋漢藏語的對應規律。而台灣南島語的國際權威李壬癸院士，也不認同沙加爾—邢公畹有關漢藏語與南島語的發生學關係。不可否認的，梅祖麟院士早年的引介之功，產生很大的影響。

二、新起三家向李方桂（1971）的上古音系統的疏離

龔煌城（2002：1）〈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指出：

李先生上古音學說卓越的地方，也必須從它與當代各種不同的學說的比較中，才容易看的出來。要從分歧的各種學說中擷取精華，必須具備學術眼光，否則可能只會採集到糟粕；要提出獨創的見解，則必須具備洞見，而李先生則兩者兼而有之。

接著龔先生指出李先生（1971）發表 31 年之後（2002），有關上古音的論文中較全面性的論述有 Starostin（斯塔羅斯金 1989），白一平（Baxter 1992）與潘悟雲（2000）等人的著作。鄭張（2003）《上古音系》當時尚未出版，故以其高足潘悟雲為代表。

龔先生首先指出李方桂繼承前人的研究有四點：三等韻構擬 *-j- 介音、陰聲韻尾構擬 *-g，*-d，*-b、上古侯、東部構擬 *-ug，*-uk，*-ung、以及上古之、蒸、微、文、緝、侵諸部構擬元音 *ə 等。龔先生利用四個小節，舉出漢藏語的同源詞的例證，說明李先生繼承前人的這四點都是正確的。我們只舉其第四

點 *ə 元音爲例，龔文（2002：10-11）說：

上古之、蒸、微、文、緝、侵諸部的主要元音，自高本漢以來，經董同龢（1944）、陸志韋（1947）、藤堂明保（1957）、王力（1957）、雅洪托夫（Yakhontov 1965：27）、Starostin（1989：428）都構擬 *ə 元音，至白一平（Baxter 1992）而改擬為元音 *i。潘悟雲（2000：262）則構擬為元音 -u。潘悟雲、馮蒸（2000：201f）指出之（職）、蒸的元音是 -u，但是有音位變體 -ə，並說明作此構擬主要的理由有四點，其中較重要的是說「之部在《詩經》中既跟幽部合韻，也跟魚部合韻。」又說「與幽部 u 合韻的是 u，跟魚部 a 合韻的是 ə。」從這句話來判斷，潘悟雲與馮蒸所謂的「音位變體」可能並不是指一般人所瞭解的 allophone 而言，因為決定是否為「音位變體」不是看音韻環境是否互補，而是看該字與哪一個韻部的字構成合韻。《詩經》合韻的例子很多，他們是否要把所有的不同的合韻都看成代表不同的「音位變體」，不得而知，如果不是，那麼究竟要如何劃分界限，也未見有任何交代。我認為較合理的處理方式應該是假定每一個韻部都只有一個元音，與幽部合韻的字跟與魚部合韻的字都是 ə。因為幽部的元音也是 ə (-əgw)，所以之、幽兩部才可以合韻。

潘、馮把之部與幽部合韻的元音說成 -u，把之部與魚部合韻的元音說成 -ə，又說 -ə 是 -u 的音位變體，不知這是哪門子的音位理論，令讀者如墜五里霧中。龔先生的質疑是非常明確的，正因為他們搞不清音位與變體的關係，循著相同的思路，就很容易把六個主要元音音位，各賦予一分爲三的音值，從而把傳統三十個韻部經王了一等學者高度音位化的五／六元音系統區分成五十幾個韻類，說它們與六元音的格局相通是變體或通變云云，關鍵即在徒有六元音的空架子，不能解釋詩韻的傳統。

龔先生（2002：11）接著指出：

潘悟雲與馮蒸因為誤把幽部構擬為 u，才會想要把與它合韻的字盡量靠近

u，因而有構擬 u 音的構想。李先生（1971：30）就明白指出幽部跟之部距離最近，兩部元音相同，只有韻尾輔音不同而已。他（李方桂 1971：30）說「這部跟之部的距離最近，古韻中跟之部字往往有諧韻的例子。因此我們認為這部的元音是 ə，iə 與之部相同，只有韻尾輔音不同，之部是 *-k，*-g，而幽部是圓唇的舌根音 *-kw，*-gw。」

潘悟雲與馮蒸所提出的之部構擬 u 音的另一個理由是潘悟雲（2000：212）：「這個音不僅能很好地解釋之幽之間的密切關係，還能更好地解釋之部字向中古的演變方向。從之部來的中古咍韻是 M.-əi，如果之部按李方桂擬作 *-əg，或照王力擬作 *-ə，都無法解釋其中的韻尾 *-i 是怎麼來的。」並說「鄭張尚芳（1998）提出公式：*-u > *-əu > *-əi > M.-əi 就能較好地解釋咍韻的來歷。」究竟 *-əg > *-əi 較能解釋 i 的來歷或是 *-u > *-əu > *-əi > M.-əi 較能解釋，本來是一目了然的，竟也會有見仁見智的不同，可見古音研究的難度了。

由於鄭張、潘擬音系統標榜為國人創立的兩派擬音體系之一，即以錢玄同、王力、陳新雄等下迄鄭張的陰聲韻不帶塞音韻尾的一派，與承襲高本漢以來帶塞音尾或西門華德等的改良韻尾派的周法高、余迺永、丁邦新、龔煌城等人為別派，簡言之，即王力與李方桂兩派。從李派的元音系統看來，上古之 *-əg > 咍 əi 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倒是王力擬作 *-ə 才是無法解釋中古咍韻 əi 的韻尾 -i 之來源。怎能連帶懷疑不同韻尾構擬的李氏系統？

龔先生（2002：11）又從不同角度批評幽部韻母構擬為 *u 的缺失，他說：

但是由於上古韻母系統的構擬環環相扣，所以只要有一個韻母構擬錯誤，便連帶的影響到其它韻母的構擬。之部元音構擬為 *-əg 本來是根本不成問題的，卻因為錯把幽部韻母構擬為 *-u，才想到要把之部拉近 *-u 的位置作 *-u，以便解釋之部與幽部之間的關係。李方桂先生（1971：30）把幽部構擬作 *-əgw、*-əkw，與之部的 *-əg、*-ək 元音相同，韻尾發音

部位也相同，這才是真正的「不僅能很好的解釋之、幽之間的密切關係，還能更好地解釋之部字向中古的演變方向。」之部 $*-\text{əg}$ 的韻尾 $*-\text{g}$ 演變為中古的 $*-\text{i}$ 是順理成章。 $*-\text{əg} > *-\text{əi}$ 的演變遠比潘悟雲 (2000 : 212) 所極力推崇的，鄭張尚芳 (1998) 所主張的 $*-\text{u} > *-\text{əu} > *-\text{əi} > \text{M.}-\text{əi}$ 自然而合理。²

龔先生 (2002 : 11-12) 更從漢藏語同源詞的元音對應之不尋常，指出潘悟雲與馮蒸 (2000 : 201) 在比較法上的盲點：

潘悟雲與馮蒸也提到之 (職)、蒸跟漢藏語的同源詞，認為這一部「跟藏語同源間的語音對應關係最複雜，反映這三部字在原始漢藏語中的複雜來源。」據他們所舉的例字，這一部的元音跟藏語的 o , a , i , e 之間都有對應的同源詞。我們知道，藏語才只有五個元音，其中竟有四個元音對應漢語的一個元音，這不能不令人懷疑這些同源詞的可靠性。我不打算在這裡對這些同源詞一一檢討。我主要的目的是要指出漢語之、蒸部元音應該作 $*-\text{ə}$ ，它與藏語、甚至與原始藏緬語的 $*-\text{a}$ 對應，而這樣的對應顯示，從原始漢藏語到原始藏緬語之間曾發生 $*-\text{ə} > *-\text{a}$ 的變化 (參看龔 2002)。這裡的主要論點是：假設 $*-\text{ə} > *-\text{a}$ 的變化比假設 $*-\text{u} > *-\text{a}$ 的變化合理的多，而且很可能 $*-\text{ə} > *-\text{a}$ 的變化也在漢語的若干方言中發生過，因而有之、蒸 ($*-\text{əg}$ 、 $*-\text{ək}$ 、 $*-\text{əng}$) 與魚、陽 ($*-\text{ag}$ 、 $*-\text{ak}$ 、 $*-\text{ang}$) 的合韻發生。

本節標題用「疏離」，旨在強調白一平、潘悟雲等傾向上古三等沒有介音 $-j-$ ，認同王力陰聲韻開尾說，上古侯、東部主元音改擬為 o 及之、蒸、微、文、緝、侵諸部元音不用 ə 改用 i 或 u ，但是 Starostin 依舊用 ə ，白一沙

² 第一段提到雅洪托夫 (Yakhontov 1965) 龔文原有小注：雅洪托夫除了緝、侵兩部構擬 $-\text{up}$ ， $-\text{um}$ 以外都構擬 $-\text{ə}$ 元音。

(Baxter & Sagart 2014) 的新擬音，有兩項變革，即棄 *i* 改 *ə*，也承認有 *-r* 尾。似乎也有向多數靠攏的意味，現在祇剩鄭、潘、馮三人主張用 *u* 元音，龔文（2002：13）在該節小結時說：「我們看到在李先生的上古音系統中沿襲舊說的部分，如……李先生的看法都與現代多數的意見相左，對這些問題，我在上文中都一一為李先生的觀點作了辯護。」

三、陳新雄對鄭張六元音系統及古韻五十八部的 質疑與鄭張尚芳的答詢

為了說明方便，我們先把鄭張（2003：64）表列斯、白、鄭張三家韻母系統列於下：

表中 ○ 表示空檔，X 表示不便相拼（易跟其他組合相混）之處。鄭張表中所注小字是該韻類的代表字，也可以看成「分部」的代稱。斯、白兩家系統的詳細情況請看原作。

表 1 斯塔羅斯金韻母系統（分 57 韻類）

	-p	-m	-t	-n	-r	-k	-ŋ	-l	-c	-j	-kw	-w
i	緝 _B	侵 _B	至	真	○	○	○	○	脂 _F	脂 _B	沃 _B	幽 _B
e	葉 _B	談 _B	月 _B	元 _B	○	錫	耕	支	祭 _B	脂 _D	藥 _B	宵 _B
ə	緝 _A	侵 _A	質 _A	文 _A	文 _C	職	蒸	之	脂 _E	脂 _A	○	○
a	葉 _A	談 _A	月 _A	元 _A	元 _D	鐸	陽	魚	祭 _A	歌 _A	藥 _A	宵 _A
u	○	○	質 _B	文 _B	文 _D	沃 _A	中	幽 _A	脂 _G	脂 _C	○	○
o	○	○	月 _C	元 _C	元 _E	屋	東	侯	祭 _C	歌 _B	○	○

表 2 白一平韻母系統（分 53 韻類）

	-j	-t/ts	-n	-0	-k	-ŋ	-w	-wk	-m	-p
a	歌	月/祭	元	魚	鐸	陽	宵	藥	談	盍
e	(歌)	月/祭	元	支	錫	耕	宵	藥	談	盍
o	歌	月/祭	元	侯	屋	東	○	○	談	盍
u	微	物	文	幽	覺	冬	○	○	侵	緝
i	脂	質	眞	○	職→質	蒸→眞	幽	覺	侵	緝
i	微	物	文	之	職	蒸	○	○	侵	緝

表 3 鄭張尚芳韻母系統（分 58[64] 韻類）

	-0	-g	-ŋ	-u	-ug	-b	-m	-l/-i	-d	(-s)	-n
i	脂豕	質節	眞𣎵	幽黝	覺弔	緝揖	侵添	脂齊	質	[至]	眞
u	之	職	蒸	幽蕭	覺肅	緝澀	侵音	微尾	物迄	[隊]氣	文欣
u	幽媯	覺睦	終	X	X	緝納	侵枕	微畏	物術	[隊]	文諄
o	侯	屋	東	宵夭	藥沃	盍乏	談贗	歌戈	月脫	[祭]兌	元算
a	魚	鐸	陽	宵豪	藥樂	盍	談	歌	月曷	[祭]泰	元寒
e	支	錫	耕	宵堯	藥的	盍夾	談兼	歌地	月減	[祭]	元仙

陳新雄（2008：11）〈鄭張尚芳《〈詩經〉的古音學價值》述評〉一文首先指出：

鄭張先生的古韻五十八部當中，歌月元有三套，宵藥有三套，盍談也有三套，而且主要元音有 o、a、e 三種的不同，因此同屬元部的「輾轉反側」一句，前面三個都是元部字，鄭張卻擬成 ten、ton、pan 三種不同的元音，我們要問，既然元音不同，為何還要叫成同樣的韻部名稱？就以元部為例吧，這三部在《詩經》押韻上分別的界線在哪裡？

1985 年，我的學生余迺永的《上古音系研究》根據白一平（Baxter）的說法主張宵、藥二部再析為豪、沃與宵、卓四部。我曾經寫過一篇《宵藥二部古韻尚能細分嗎？》（1999）的文章加以駁斥，認為無論從諧聲或

《詩經》的押韻來看，都不可再分。前幾年鄭張的高足潘悟雲先生到師大演講，我曾問他宵、藥分為三部的根據何在，潘悟雲說，他也沒有根據。我想正好請教他的老師鄭張先生，也許可給我們答案吧！自李方桂先生《上古音》發表後，一個韻部只有一個主要元音，不敢說已成定論，但的確是古音學學者一致遵循的原則，今鄭張不同元音也叫同一韻部名稱，想必有特殊的理由，我們願聞其詳。

陳新雄首先針對鄭張的 58 韻類等同韻部的元音系統來質疑元部一分為三的界線何在？其次是宵、藥分為三部的可能性。一個韻部只有一個主要元音既然為李方桂、王力的共識，鄭張尙芳何以沿用王力以來的韻部名稱，進行百思不得其解的韻類構擬，卻丟不掉傳統的分部名稱？

陳新雄（2008：12）接著指出：

中國入聲向來都認為是收清塞音 -p、-t、-k 的韻尾，而今鄭張改作濁塞音 -b、-d、-g 的韻尾，根據的都是同語族語，如藏語等。但漢語確實有清塞音韻尾，如閩、粵方言就是，雖然說漢語也有濁輔音韻尾，如所舉丁邦新（1979）閩南話合音例「出去」tsʰut + kʰi → tsʰuli、「入去」dzip + kʰi → dzibi，這只是夾於元音之間被同化而已，不像清塞音韻尾那樣成系統。不知為何鄭張先生要捨漢語的近，而取藏語等的遠？

此外，鄭張先生的幽覺、緝侵也各分成三套，尤其奇怪的是幽、覺與終配的那套主要元音是 u，韻尾為收喉的 -0、-g 與 -ŋ，其餘兩套，一套主要元音是 i，韻尾是收唇的 -w 與 -wg，另一套主要元音是 u，韻尾亦為收唇的 -w 與 -wg。緝侵三套雖然韻尾都是收唇的 -w 與 -wg，但主要元音也有 i、u、u 三種的不同。像幽覺終與其他的兩套幽覺，主要元音既不相同，韻尾也不一樣，還能認為是同一個韻部嗎？這跟我們一般研究聲韻學的人的想法，可以說是大異其趣！脂質真有兩套，主要元音雖然都是 i，但韻尾卻有收喉的 -0、-g、-ŋ 與收舌的 -l/i、-d、-n 的不同。

微物文也有兩套，韻尾雖然都是收舌，但主要元音卻有 *u* 與 *ü* 的不同。這樣複雜的擬音，不要說是初學，甚至於研究聲韻學多年的人，也被搞得如墮入五里霧中了。以此去檢驗《詩經》的韻語，不但不能證明什麼，卻反而弄得更不清楚了。

這篇述評是 2007 年 11 月輔仁大學中文系主辦第六屆先秦兩漢國際學術研討會（詩經研究專題），針對鄭張論文〈《詩經》的古音學價值〉的講評稿，全文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先質疑鄭張論文的六元音統與古韻五十八部配當表。即是以上這四段話，鄭張後文（2015）概括爲三個問題：一韻部多元音、入聲收濁塞尾、幽覺再分部的依據。第二部分才是針對鄭張的論文所提出的三項質疑，鄭張後文（2015）概括爲：聲母複輔音不成音節、睢鳩對睢鳩詞意不合、「我乃」連讀合音爲「言」罕見等。

鄭張尙芳（2015）〈謹謝伯元先生質詢〉一文，回覆了陳新雄的六點質疑，這篇文章收在《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2015：103-110）。鄭張在宣讀論文時，就有針對第二部分作扼要回答，至於超出其論文的第一部分大哉問，在有限的答詢詩間，自然無法暢所欲言，在陳新雄逝世後近三年撰成專文答詢，其情可感，古人有生死論交，鄭張此文堪爲現代典範。先錄一段鄭張尙芳的「前言」：

伯元先生是我所敬仰的學者，我們觀點有同有異，這是學界最正常不過的事。從大的方面來說，我在《上古音系》第二章 1.4「國人創立的兩派擬音體系」中是把伯元先生引爲同派的，因為我們都堅持陰陽入三分、陰聲韻不帶塞音尾說，破除了高本漢以來擬上古陰聲韻帶塞音韻尾的痼見，那可是連李方桂、董同龢、陸志韋等名家都遵從的呢。而由於伯元先生在其質詢中，對我的擬音系統作了詳細介紹，使它引起臺灣學界關注，又由於先生傳統音韻學功底深邃，他的質詢能夠反映很多傳統音韻學者對我們新說的疑惑，所以我很感謝伯元先生的質詢，認爲答疑之作乃是必要的，亦是對伯元先生最好的懷念。

以下三段，就是鄭張論文中對陳新雄前三點質疑的答詢，爲了存真，不計引文長短：

（一）韻部與韻母韻類

質詢列出了鄭張「六元音系統與古韻 58 韻部配當表」全表，問：「58 部當中，歌月元有三套，宵藥有三套，盍談也有三套，而且主要元音有 o、a、e 三種的不同，因此同屬元部的『輾轉反側』一句，前面三個字都是元部字，鄭張卻擬成 ten、ton、pan 三種不同的元音，我們要問，既然元音不同，為何還要叫成同樣的韻部名稱？」

因為漢語古音研究導源於前儒對《詩經》韻讀所體現的韻部研究，所以很早就形成一種韻部即相當韻母的思潮，加上近期李方桂先生也是這樣主張。王力先生《上古韻母系統研究》原曾正確地提出「上古韻部與上古韻母系統不能混為一談。凡韻母相近者就能押韻；然而我們不能說，凡是押韻的字其韻母必完全相同，或其主元音相同。」但他後來也採用了李先生的主張。因此伯元先生據此也把鄭張的上古 58 韻母誤看做 58 韻部了。鄭張此表見於《上古音系》第五章 2.7 節韻母組合結構表，明確說的是「6 元音與韻尾可組成 58 個基本韻母」，而並非 58 韻部表。鄭張認為上古音系應以描述聲母韻母系統為主，而非韻部系統，特別強調兩者有重大差別，絕對不可混淆。曾指出韻部只是《詩經》的韻轍系統，相當現代歌曲的「十三轍」或《蒙古韻》的「十五韻」，不能用它頂替語言的韻母系統。今天歌曲裡的中東轍既可兼收不同元音韻的「eng、ing、ong、iong」，《蒙韻》的寒韻可相容「an、on、uan、ien」，都是鐵的事實，則在與韻轍相當的韻部系統中，主張一個韻部只能有一個元音，就是違背事實的。因此鄭張系統強調韻母為 58（再加上聲-'尾、去聲-s 尾則為 151 韻母），而韻部仍沿用王力 30 韻部部名（但改冬部為終部，後期因 -s 變 -h 時部分留存 -s 而分出「祭隊至」部則為 33 部），所以在押韻上，an、on（=oan）、en 同列為歌部而相叶韻，韻母元音則分三套等，

都是不足為奇的，韻部概略粗疏，自然難比韻母之精詳。今漢語 en、in、un、yun 同押入辰轍，但並沒要求 in 要改讀 ien，為什麼上古押韻就都得改成同元音，這是說不過去的。我在論述韻部與韻母關係時，也將各類韻母稱為「分部」或「韻類」。

同部韻讀有不同元音並不影響押韻，但在語言構詞法系統上則可以顯示不同的規律。（下略）

（二）幽覺的韻尾及再分韻

上古幽覺部也分三套 w 尾韻母（其中 uw=u，若分寫竟有四套了），這 w 尾也見於宵藥部，質詢問：各分三部根據何在。

我們的根據是黃侃以一等、四等皆為「本韻」，不得同部。所以凡是一四等韻同部者，都是不同韻母雜糅造成的，應該再行分韻。一般是低元音系列分列一開（一等開口）為 a、四開為 e，一合為 o，或者高元音系列一開為 u、四開為 i（含舌齒 u）、一合為 u。

由於叔聲有一開（督）又有四開（寂），有入又有平（椒），我們需要有 -w 和 -wg 的設計，如果只有 u 沒有 uw（一合），來與 uw、iw（四開）相配，就解釋不了四等字的產生條件。李方桂、王力對四等韻上古設 i 介音是不可信的，音韻學界已證明中古切韻音四等自身屬於前元音，原無 i 介音，四等韻增生 i 介音是一個唐中期以後才出現的中古後期現象。

（三）入聲收濁塞尾

質詢：入聲向來認為收清塞音尾，漢語閩粵方言就是，鄭張根據藏語等同族語改收濁塞音尾，問：不知為何鄭張先生要捨漢語的近，而取藏語等的遠？

閩粵等方言現在收清塞尾是其整個音系濁塞音都已清化的結果，今漢語今藏語同樣都已走上清化之路，但古藏文還保留濁塞聲母，這樣其塞尾採用濁尾不用清尾恰好表現了更早的原貌，可供擬音參考。所以在漢語方言中也需要找到音系仍有濁塞音的方言來觀察其入聲清濁抉擇情況，雖然保留濁母的吳語入聲都已改收喉塞尾，幸好我們還找到了廣東連山粵語和江西湖口流芳贛語，它們的全濁聲母仍讀濁音，而其入聲即收濁尾（詳拙作《上古入聲韻尾的清濁問題》）。例如連山：白 bag、席 zɛg、截 zid，流芳鎮：直 dzig、拔 bal。

我們的擬音首先根據是漢語，不過參考了記錄更古形式的兄弟語。只是方言中僅留的古老子遺現象尋覓不易，比如上聲收喉塞的漢語方言仍很多，但上聲收喉塞與去聲收 -h 並存的方言現在只找到山西孝義一個點。

作為陳新雄的弟子，應該認知被戴上「傳統音韻學者」的帽子，就是被認為對自喻為新派學者的新說，充滿疑惑。其實任何創新，都是對傳統學說的一種挑戰，必須要有充分的理據和可驗證性，不能以為新的就是好的。此點從前節論及龔煌城對李方桂繼承高本漢的四個舊說為構擬的起點是正確的，而且極力辯護，並拿出可靠的漢藏語同源詞，這才是決定的關鍵。

鄭張尚芳自 1981 年以來相繼發表一系列上古音論文，其中最主要的兩篇〈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1987《溫州師院學報》）和〈上古漢語聲母系統〉（1995 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 ICCL-4 論文）。此二文由沙加爾英譯，合編為“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Old Chinese”，2000 年在法國出版。鄭張是王力、李方桂之後，最具獨創性及有國際影響力的新派代表。他自己指出：「文章主要論證如何填補王、李二氏系統中的空檔，擬了一個長短六對元音的系統：脂 i、之 u、幽 u、支 e、魚 a、侯 o。認為 30 韻部中『一部一元音』的規則，只適用於收喉各部（含開尾韻），收舌、收唇各部則皆含兩個或三個元音，因此還得再細分：歌祭元談宵 a、e、o，微隊文 u、u，侵 u、i、u，幽（-w/u 尾部分）u、i。……指出一、二、四等韻同來自於長元音

（四等韻即是一等韻的前元音部分，兩者互補，二等則是一、四等的帶 r 部分），而三等韻則具有與其相對的短元音；三等韻中重紐四等是其前元音部分，重紐三等及庚、蒸等韻是其帶 r 部分，從而解釋了四『等』及介音的來源，r 和 l 介音出現的條件。認為上古沒有元音性介音，只有後墊於聲母的半通音 r、l、j、w。」（鄭張尚芳 2003：20）

因為是「大咖」，所以大破大立，常用自己界定的名詞，完全不管傳統學者約定俗成的規範，「韻部」是其中之一。例如上文他說：

韻部只是《詩經》的韻轍系統，相當現代歌曲的「十三轍」或《蒙古韻》的「十五韻」，不能用它頂替語言的韻母系統。今天歌曲裡的中東轍既可兼收不同元音韻的「eng、ing、ong、iong」，《蒙韻》的寒韻可相容「an、on、uan、ien」，都是鐵的事實，則在與韻轍相當的韻部系統中，主張一個韻部只能有一個元音，就是違背事實的。

我們首先要指出，傳統音韻學者，從來不把「韻部」看成《詩經》的「韻轍系統」，而是一個是歸納最早的詩歌文獻押韻現象，得到的類，並經過有清三百年的學者，不斷分析韻例，統計常例與例外，建立本韻、通韻、合韻的關係，形成的嚴格的古韻部系統，它雖然不能等同於韻母系統，但韻母系統就在其中，誰說一部一個主要元音，就沒有韻母系統？王力、李方桂先生構擬的同部內四等韻母的差異，怎麼不是韻母系統？從「韻部」完全可以看到它到中古的演變規律，僅因少數中古對立無法投射到這個系統，就否定傳統擬音的合理性，必須另起爐灶，建立在新的假說上。

最先以詩歌押韻證據指出一個韻部不一定只有一個主要元音的是俞敏。他在〈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1999[1979]）提到：

看待押韻和韻部有兩種不正確的想法。一種是像毛奇齡在《古今通韻》裡提出的「五部三聲兩開兩合」，最後等於否定分部。另外一種——這種人多得多——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把古代詩人作詩

看成明清人作試帖詩押官韻，別看「十三元」該死，也不敢不兢兢業業遵守，要不然官兒就飛了。凡是假定「一部只許有一個元音」，「在一塊兒押韻的元音準一樣」這類理論的，都是走另外一個極端的。這兩個極端上的人，想事的方法都有毛病。最好的藥方兒是找民間藝人學習。

他接著舉北方民間藝人唱大鼓，押韻是「十三轍」。例如：

普通的一轍到底的段子最常用的是「江陽」。京韻大鼓《大西廂》那麼長的段子，江陽一轍到底。為什麼？字多好押韻麼。

「中東」轍包括 /əŋ/，/uŋ/，/iŋ/，/iuŋ/，也就是把《中原音韻》的「東鍾」跟「庚青」合起來了，為什麼？字少，特別是「東鍾」字少，光用它押韻不夠用。

又如：

屬一七的有 [i]，[y]，[ɿ]，[ʊ]，此外還有個「隨」是「合韻」。一轍四個元音。為什麼？字少。要要求一部一個元音，乾脆別作了！形式跟內容有矛盾的時候，內容總要衝破形式麼！

這是從字的多少（內容）看押韻的轍（形式）並非一「部」一個元音。其實俞敏和鄭張均忽略了押韻的本質，就是主要元音和韻尾相同。十三轍的每一轍均只有一個主要元音，仍然服膺一部一個主元音的原則，請看王力（1972：30）的十三轍韻母表：

無尾韻母	韻 呼		低	次低	次高	高元音	高元音			
			開	齊	合	撮	開	齊	合	撮
	轍		開	齊	合	撮	開	齊	合	撮
	麻沙		a 麻	ia 家	ua 花					
	乜斜			iɛ 斜		yɛ 雪				
	梭波		ɤ 歌		uo 波					
	衣期						ĩ 時	i 期		y 居
有尾韻母	韻 呼		a 系統				ə 系統			
			開	齊	合	撮	開	齊	合	撮
	i 尾	懷來	ai 來		uai 懷					
		灰堆					əi 飛		ui 灰	
	u 尾	遙迢	au 桃	iau 遙						
		由求					əu 抽	iu 求		
	n 尾	言前	an 干	ian 前	uan 關	yan 全				
		人辰					ən 人	in 林	un 村	yn 君
	ŋ 尾	江陽	aŋ 郎	iaŋ 江	uaŋ 光					
		中東					əŋ 成	iŋ 英	uŋ 東	yŋ 雍

王力（1972：26）說：

音韻學的標準和語音學的標準不同：音韻學並不要求韻母的主要元音完全一致，音色近似的元音也可以認為是屬於同一個韻部。下面我們分別敘述劃分韻部的標準。

ī 和 [i] 被認為是同一個韻部。本來，ī 本身就包括兩個不同的元音：[ɪ] 和 [ʏ]。但是，這兩個元音的位置是跟前面輔音的位置相一致的，[ts]，[tsʰ]，[s] 後面只能有 [ɪ]，不能有 [ʏ]；[tɕ]，[tɕʰ]，[ɕ]，[tʃ] 後面只能有 [ʏ]，不能有 [ɪ]，可見 [ɪ] 和 [ʏ] 實為一體，它們是互相補足的。至於 [i] 和 ī，它們也是互相補足的：[ts]，[tsʰ]，[s]，[tɕ]，[tɕʰ]，[ɕ]，[tʃ] 後面不能有 [i]，其餘輔音後面不能有 ī，而它們的音色又相近似，所以被認為是同一個韻部。漢語拼音方案把 ī 和 [i] 一律寫成 i，是有理由的。

[y] 和 [i] 有時候也被認為是同一個韻部，因為它們都是前高元音，發音部位是一樣的。

這一段說明，對照俞敏上文認為「一七」（即衣期）轍有四個元音，是對「韻部」的隔闕，這四個元音音色相近，又有音位性的互補關係，所以可以視為同一個韻部主要元音 /i/ 的變體。俞敏看到的是押韻現象的表面，沒有看到深層的音韻關係。同樣，王力（1972：26）指出：

[əŋ]，[iŋ]，[uəŋ]，[uŋ]，[iuŋ] 被認為是同一個韻部。[iŋ] 是 [əŋ] 的齊齒呼，事實上也有人說成 [iəŋ]，不過 [iŋ]，[iəŋ] 可以互換罷了。[uəŋ] 是 [əŋ] 的合口呼沒有問題，它在普通話裡和 [uŋ] 是互換音位，在零聲母是 [uəŋ]（翁），在輔音後是 [uŋ]（公）。[iuŋ] 被認為是 [yŋ]，作為 [əŋ] 的撮口呼。

這是對中東轍包含 ə 系統由四個元音 ə , i , u , y (或 iu) 組成 əŋ , iŋ , uŋ , yŋ 四種韻母同屬一個韻部的音理分析。就北京話而言，無關乎《中原音韻》的「東鍾」跟「庚青」的來源，更不是什麼「字少」不夠用。鄭張根據俞敏的想法，認為中東轍兼收不同元音的韻母為 eng , ing , ong , iong ，以 o 元音取代中東轍的 u 元音，又以漢語拼音的 e 取代 əŋ 的元音，自然無法呈現王力分析的四個韻母同屬 ə 系統，其實鄭張的 ong , iong 就是 ung , iung ； eng 即是 əŋ ，他們的基底形式是 əŋ , iəŋ , uəŋ , yəŋ ，所以十三轍韻母表下欄「有尾韻母」的八個轍，分屬兩類相同的主元音，即 a 系統（懷來、遙迢，言前，江陽）與 ə 系統（灰堆，由求，人辰，中東），相同主元音加上同一韻尾，才能成轍。十三轍韻母表上半欄的無尾韻母，麻沙、乜斜、姑蘇都只有一個元音，一目瞭然，較複雜的衣期（一七）轍，前已分析。剩下只有梭波兩個韻母的關係，王力（1972：27）說：

[ɣ] 和 [o] 被認為是同一個韻部。[ɣ] 和 [o] 不相對立：[ɣ] 只用於開口呼，[o] 只用於合口呼，互相補足。

所以鄭張認為十三轍有許多包含不同主要元音，乃是對十三轍的誤解，他援引的中東轍的 eng 、 ing 、 ong 、 iong ，以為可以證成古人韻部同樣可以細分出 e 、 i 、 o 三個元音，其實是經不起分析的，因為中東轍只有 u 元音沒有 o 元音，以 o 代 u 有點移花接木。

相較於俞敏，鄭張（2003：57）才針對「每部一元音」提出了較全面的見解：

高本漢每部元音太多是其大疵，王力、李方桂一反其道改為每部只有一個元音。俞敏（1984）批評兩者都走了極端，指出不能說「一塊兒押韻的元音準一樣」，民間藝人押十三轍，不可能一個轍是一個元音，拿十三轍當北方話韻母系統擬元音，跟拿《詩經》韻部當上古音韻母系統擬元音同樣荒唐。鄭張則提出不應該一刀切，「每部一元音」在一、四等不並存的收喉各部是完全正確的；在一、四等並存的收舌、收唇（包括收 $-\text{w}$ ）

各部，則每部實含二至三個元音，應該再行細分：i、u、ü 為一類，a、e/ɛ、o/ɔ 為一類。

筆者有三點補充說明：

1. 從上面引文，俞敏批評的兩個極端，針對的是看待押韻和韻部的不正確思維，一邊是毛奇齡的《古今通韻》，另一端是凡是假定「一部只許有一個元音」的理論，並非針對高本漢。王、李修正高本漢，目的是進行音位化，取代高、董的音值擬音。依上面引文，俞敏批評的兩個極端，針對的是看待押韻和韻部的不正確思維，無關擬音方法（approach）的差異，談不上兩個極端。
2. 「拿十三轍當北方話韻母系統擬元音，跟拿《詩經》韻部當上古音韻母系統擬元音同樣荒唐。」這個論斷是不正確的。由韻部去構擬音讀，參考後代音系（即切韻架構），歸納出所謂韻母系統，乃是音位化的產物。因此從十三轍分析出北方話的韻母系統，與從《詩經》韻部去構擬上古韻母系統本來是兩者都可以辦到的。
3. 鄭張所謂的不該一刀切，兩段均是「假設」。從詩韻歸納出來的古韻部，當然不會有一、四等並存不並存的先驗機率，用中古四等框架反過來規範每一部應該再細分幾個元音，與詩韻傳統只能越走越遠而已，所以陳新雄無法接受這種分析。

四、從何大安評白、沙新著的「一部多音」看上古韻部的界說與詩韻正統

（一）引言與解讀

美國密西根大學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教授和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沙加爾（Laurent Sagart）教授合著的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一書，2014 年 9 月由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該書獲得了美國語言學會（LSA）所頒發的 2016 年度「布隆菲爾德圖書獎」（Leonard Bloomfield Book Award），

並受到學界廣泛的矚目。個人在偶然的機會獲知中央研究院的何大安院士已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語言學報》(JCL) 44 卷 1 期(2016 年元月)發表一篇書評，題目中譯為：〈這樣的錯誤不應該有：評白一平、沙加爾的《上古音新構擬》〉。

何文先簡介這本新著的內容如下：

《上古音新構擬》共分六章，分別是導論 (Introduction)、取材 (The Evidence for Old Chinese)、概說 (An Overview of the Reconstruction)、上古聲母 (Old Chinese Onsets)、上古韻母 (Old Chinese Rhymes)、結論 (Conclusion) 等幾個部分，正文之後列有附錄、注解、書目和索引。全書內文共 431 頁，目前中譯本尚未出版。

按理，這是一本上古音最當紅的新著，兩位作者跨國合著，均為這個領域的拔尖人物，隨後的書評應該譽多於貶。何院士的書評主標題 “Such error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似乎求全責備的口氣很重，是出於學術的針砭？還是對本書的基本觀點有完全相反的立場，並不同意白一沙的新系統？經過個人細讀何評的全文及理解《上古音新構擬》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發現何氏的批評聚焦在方法論及學術著作嚴謹度上的要求。何評共提出六個批評主題，代表本書有六個不能原諒的缺點，分別是：(1) 一部多音 (One rhyme group with many vowels)、(2) 孝義存古 (Retention of old features in the Xiaoyi dialect)、(3) 譯音證尾 (Using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 to prove final coda)、(4) 午五異聲 (午 and 五 not homophonous)、(5) 指馬為鹿 (Calling a horse a deer)、(6) 山崖也 (A mountain is a river bank)。

何文的結論是：「我們認為這部新著犯了許多不該有的錯誤，這些錯誤反映了作者觀念的落伍與基本訓練的不足。總體而言，這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據中文摘要)。

(二) 評白一沙的韻母系統與元音的搭配

《上古音新構擬》(Baxter & Sagart 2014) 一書的成果奠基於白一平 (Baxter 1992) 《上古音手冊》一書，該書首次以上古音的專著提出異於前修 (如王力 1957-1958、陳新雄 1969、李方桂 1971) 的古韻部新說，而且繼承漢藏語言學家包擬古 (N.C. Bodman) 1980 年提出及白一平 (Baxter 1977) 及 (Baxter 1992) 師承其師的六元音系統。中國學者鄭張尚芳 (1984) 也構擬六元音的系統，不過內容與王力 (1978) 的六元音系統有實質的差異。

在《上古音新構擬》第 49 頁和第 196 頁，作者列出上古音的韻母表如下：

TABLE 5.3 Rhymes reconstructed for Old Chinese

	*-∅	*-j	*-w	*-n	*-m	*-ŋ	*-r	*-t	*-p	*-k	*-wk
*i	—	-ij	-iw	-in	-im	-iŋ	-ir	-it	-ip	-ik	-iwk
*u	-u	-uj	—	-un	-um	-uŋ	-ur	-ut	-up	-uk	—
*ə	-ə	-əj	—	-ən	-əm	-əŋ	-ər	-ət	-əp	-ək	—
*e	-e	-ej	-ew	-en	-em	-eŋ	-er	-et	-ep	-ek	-ewk
*o	-o	-oj	—	-on	-om	-oŋ	-or	-ot	-op	-ok	—
*a	-a	-aj	-aw	-an	-am	-aŋ	-ar	-at	-ap	-ak	-awk

爲了方便和傳統古韻部對照，何大安 (Ho 2016 : 182) 轉寫爲下表，把原來被省略的韻部名稱補出。這個表與鄭張 (2003 : 64) 所引用的 53 類表已有差異，後者是據白 (Baxter 1992) 的版本。

	-∅	-j	-w	-n	-m	-ŋ	-r	-t/ts	-p	-k	-wk
i	○	脂	幽	真	侵	蒸>真	真	質	緝	職>質	覺
u	幽	微	○	文	侵	冬	文	物	緝	覺	○
ə	之	微	○	文	侵	蒸	文	物	緝	職	○
e	支	(歌)	宵	元	談	耕	元	月/祭	盍	錫	藥
o	侯	歌	○	元	談	東	元	月/祭	盍	屋	○
a	魚	歌	宵	元	談	陽	元	月/祭	盍	鐸	藥

何文補出的韻部名稱共 31 部，如果把祭併入月，共 30 部，與郭錫良（2010：5）據《漢語史稿》所訂 30 部相合。³

從《上古音新構擬》表 5.3 所填實的是古韻三十部分布在元音與韻尾搭配表的 66 個組合，原表以橫線「—」代替空組合（何氏用 ○ 表示）共有七處，即白、沙沒有 i、uw、əw、ow、uwk、əwk、owk 七種韻母類型，所以實際上有 59 個實格，也就是相當於 59 類韻母，但不等於傳統的「韻部」，因為韻部的分合是建立在相同主元音，可以押韻的基礎上。何大安指出：

我們發現，同一個韻部（按：指三十部）有的主要元音相同，如魚陽鐸；有的有兩個不同的主要元音，如幽覺；有的有三個不同的主要元音，如侵緝、談盍，（歌）元月／祭。……六元音中卻有半數的元音可以出現在同一個韻部裡，如侵緝、談盍，（歌）元月／祭，這樣的押韻型態，不符漢語的詩學傳統，也不符合上述對其他語言押韻的觀察。⁴

丁邦新（1994：32）的批評更簡明易見：

如果認為《詩經》時代歌祭元三部都各有三種韻母，如元部有 en、an、on 等三種，那麼就要費許多力量來解釋《詩經》押韻的現象，未必與事實相合。

這就是何大安與丁邦新針對白一沙系統「一部多音」的主要批評。何文質疑於白一沙系統的 59 類韻母與元音構擬，正猶上文陳新雄質疑於鄭張尚芳的 58 韻母與傳統韻部的關係，何以不相同的元音仍用相同的韻部名稱，問題相同，幾為異曲而同工。

³ 按王力（1988）《漢語史稿》（王力文集第九卷）先秦古韻分為十一類二十九部，郭云：「這是《詩經》時代的韻部系統。為了便於瞭解冬、侵分部的情况，將侵部的合口標作冬部，成為三十部。」

⁴ 何大安（Ho 2016）書評的中文稿，頁 5；JCL 英文版，頁 183。

白一平(1994)〈關於上古音的四個假設〉一文，有關圓唇元音的假設，曾指出文部元音二分的機率，他說：

而如果用清代學者所擬定的韻部，圓唇元音假設確實有問題。比方說，按照圓唇元音假設，文部的一部分字要擬測展唇的 *-in，還有一部分要擬測圓唇的 *-un，而 *-in 跟 *-un 有不同的主要元音，不應該相押。

我本來接受李先生的說法，認為雅洪托夫的圓唇元音到了《詩經》的時代已經變成複合元音了，這樣說就避免跟傳統韻部發生衝突。不過，我自己研究《詩經》的韻文的時候就發現，圓唇元音和展唇元音相押的例子實在不多，多半不超過清代學者的韻部之間的接觸。我也採用了概率論的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詩經》韻文裡圓唇元音和展唇元音相押的例子那麼少，可能不可能是偶然的現象？結果是，這個可能性非常小。這個問題很複雜；我的書裡說得相當詳細，但我現在只能舉幾個例子。

文部的情形特別清楚。我按照圓唇元音假設，把《詩經》的文部韻字分成 *-in 部和 *-un 部，在附錄裡列出。結果是，*-in 和 *-un 相押好像只有一次，即《大雅·鳧鷖》第五章(248.5)有一個句子「公尸來止熏熏」，韻字是「熏」，這裡跟展唇的 *-in 押韻；但是《大雅·雲漢》第五章(258.5)有一個句子「憂心如熏」，同一個「熏」字跟圓唇的 *-un 押韻：

(21)《大雅·鳧鷖》(248.5)：「公尸來止熏熏」(跟 *-in 押韻)

《大雅·雲漢》(258.5)：「憂心如熏」(跟 *-un 押韻)

那麼，除了「熏」字以外，展唇的 *-in 部和圓唇的 *-un 部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很多傳統的韻部之間沒有那麼清楚的界限。⁶

白氏在文末附錄的文部的分析，舉出：

《詩經》*-in 的韻字 (36 字) 列出獨韻的篇章 21 次

《詩經》*-un 的韻字 (27 字) 列出獨韻的篇章 23 次

-in 部、-un 合韻 248.5A (僅此一章)

爲說明其概率論分析，也把上引文末之注 6 列於下：

按照概率論的分析，*-in 和 *-un 合韻的例子這麼少的概率不超過 0.00042 (Baxter 1992: 430)。如果跟脂微兩部的情形比較，王力先生說，110 個例子之中，脂微合韻的例子只有 26 個，而這「不能認為偶然的現象」(王力 1980[1937]: 146; 1980 本的數目跟 1937 的原本稍有出入)。據我的分析，傳統文部裡有 38 條韻文，其中下面討論的《大雅·鳧鷖》第五章是唯一的 *-in 和 *-un 合韻的例子。

這似乎局部回應了文部元音可以二分的理由。然而，關於「一部多音」，何文提出嚴正的立場，他說：

兩位作者在這本書的一開始，就明確的界定「上古音」的時間範圍，是從西元前 1250 年到西元前 221 年，也就是晚商到秦統一的一千年間 (頁 1)。在這一段時間之內，與上古元音相關的最基本、最成系統、也最重要的語言事實，是當時的文字可以在詩篇和韻文中藉由押韻聯繫起來。如果沒有詩文押韻這一事實，我們所掌握的好幾千文字和諧聲字組，都只是零散的片段。正是通過了押韻，這些片段才能組織起來，才能構成復原古音——或是至少是元音——的基礎。兩周有韻金文有 488 篇 (楊懷源，2014)、《詩經》有韻的詩篇有 271 篇 (王顯，2011)，再加上屈原、宋玉的作品和諸子散文中的韻文，這些篇章的數量是龐大的；通過對之分析所獲得的韻部，其證據力也是堅實可靠的。

古今中外的詩篇，除了少數例外，無不要求聲音的迴環重複以求悅耳。漢詩押韻以韻母為主體，自兩周、秦漢、魏晉以下絕無異辭。其迴環重複之所在，必當韻母，而韻母之中能當迴環重複之重任者必為主要元音，亦絕無可疑。下至民間歌謠，莫不如此。這項詩學傳統，我們必須充分尊重。上古音一字一音節，即使如兩位作者在〈結論〉一章所說主要音節之前可能還有次要音節（頁319），能體現押韻作用的，也必定是主要音節的韻母。那麼同一韻部的韻母或主要元音必須相同，這一理解，也就不言自明，不容動搖。⁵

（三）舉民間歌謠為例及武鳴壯歌等說明「能在一起押韻的，主要元音也必定相同」

何文（Ho 2016）說：

一般而言，民間歌謠用韻較為寬鬆。可是李壬癸（1989）卻發現，在臺灣閩南語歌謠之中，即使韻尾輔音不同，只要主要元音相同，仍可押韻。「主要元音」相同，成為押韻的充分和必要條件。又如趙曉陽（2006）的《舊京歌謠》，共收清末民初北京歌謠308首，相當於一部《詩經》的數量。它們押韻的韻類不但暗合「十三轍」（張洵如1956，馬志偉2007），而且能在一起押韻的，主要元音也必定相同。最有啟發性的，是帶兒尾的韻腳字。由於兒化的關係，原本不同的主要元音變得相同，因而可以押韻。由此可以反過來證明，主要元音相同在歌謠押韻中確有其必要性。北京民謠也有一些例外押韻，如*i*、*y*通押之類。不過，那是不同韻轍之間的通押。用傳統的話說，那是「合韻」，而不是一韻之內又分兩種以上的主要元音。李方桂（1956）曾經注意到武鳴壯歌『元音韻嚴，輔音韻寬。』像*ai*跟*ai*，*au*跟*au*音質雖然接近，但也不能互押，而收*-m*、*-n*、*-ŋ*等韻尾的，只要元音相同可以互押；

⁵ 見何大安中文手稿第2頁。

收 -p、-t、-k 等韻尾的，只要元音相同可以互押。」（轉引自石林 1997：55）所謂「元音韻嚴，輔音韻寬」，就是說主要元音必須相同，韻尾輔音的差異可以不計。傅懋勳對西康東南地區傈僳（Lolo）族所流行的〈思故鄉〉十六句詩的韻律作過分析，他的結論是：「夷文詩沒有嚴格的押韻規律，這一章詩前三句的前半節末一字都是 u 韻，第四句前後兩節，都是 i 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四句，都是 e 韻，這種韻腳，大都是由於重複排列的關係，未必是在有意地押韻。」（1947／1995：61）因此韻韻的多寡與分節的先後，雖然繫於分章次第，「未必有意」；但是凡能押韻的，其主要元音——都是 u、都是 i、都是 e——也無不相同。漢語的南北方言和鄰近的以單音節為主的語言，其押韻條件必須是音節中主要元音的相同，而不計其韻尾的寬嚴，可以說是最簡明易解的通則。⁶

馬毛朋（2007：105-106）對十三轍及民間歌謠用韻也有相近的分析：

十三轍是俞敏、鄭張尚芳等先生認為上古漢語時期的《詩經》同一韻部可以構擬不同主要元音的根據。

北方民間曲藝用韻的韻腳，叫「軛口」或「軛兒」。在民間曲藝形成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相沿成習的「十三軛」。不過，直到張洵如先生 1937 年的《北平音系十三軛》和羅常培先生 1942 年的《北京俗曲百種摘韻》才系統的歸納出了十三軛各軛的韻字。張、羅二先生書中每軛包括的韻母相同。薛鳳生先生《國語音系解析》也詳細分析了十三軛。下面是羅、薛兩家十三軛的擬音，羅先生原用拼音標音，此處改為國際音標，下面只列出與我們討論有關的各軛的主要元音和韻尾：

⁶ 同上注。

	發花	梭波	乜斜	一七	姑蘇	懷來	灰堆	遙條	油求	言前	人辰	江陽	中東
羅	a	oə	e	iyɿ	u	ai	əi	au	əu	an	ən	aŋ	əŋ
薛	a	ə	ə	i	i	ay	iy	aw	iw	an	in	aŋ	iŋ

薛先生的音標是按嚴格的音位原則分析的結果，每轍中的韻字主要元音和韻尾相同。但從聽感來說，i、ɿ、y、ɿ的差別還是明顯的。我們暫以羅先生的標音作為討論的基礎。

從上表羅先生的標音可以看出，十三轍在語音上的表現是：一轍中，在一起押韻的字韻尾一定相同；主元音則是除了梭波轍和一七轍外，其他各轍都相同。

就韻尾來說，或許還有些例外，因為俗曲中，有中東轍和人辰轍混用的例子，不過羅先生已經解決了這一問題，他指出，這是方言色彩的表現，實際上，-n尾和-ŋ尾的字是不混押的。

再來討論梭波轍和一七轍，梭波轍，特別是一七轍，其主要元音在聽感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那麼這算是和諧的押韻嗎？是否俗曲藝人就是覺得這些不同主元音聽起來也算是押韻，也就可以一起押韻呢？只有考察十三轍形成的過程，才能把這個問題弄明白。

姚榮松（2010：143-204）〈台灣閩南語歌仔冊鄉土題材之押韻與用字分析〉一文，根據語料庫，進行大量文本用韻分析，以下是分析四本不同的長篇歌仔冊的押韻，所得到的初步韻例，可供相關民間用韻之佐證。以下是該文結論之節錄：

閩南語歌仔冊的用韻，整體而言，顯得寬泛，一般認為只要主要元音相同或相近，偶而介音或韻尾稍有出入，也是可以允許的。經過本文通盤

考察並參酌前賢的討論，得到三種韻例，即：

四句只用單一韻母例。占整首歌仔韻腳的 3/4，因此稱為「基本韻例」。

同韻異類韻母互押例。同韻指主要元音相同，異類包括介音不同、鼻化韻母、喉塞韻母、鼻化喉塞韻母。此類約佔一首歌仔韻腳的 15-25%，故稱之為「次級韻例」。

一聯中有合韻例。即一般所謂「通押」，凡主要元音或韻尾有一樣不同均屬之，約佔整首歌仔韻腳 10% 以下，有的歌仔甚至未見此類。因此稱之為「罕用韻例」。

五、上古韻部的界說與分部的依據

中國尚未有權威的語言學詞典，有關韻部的名稱，散見各種音韻學的專著及教科書。我們就以山東教育出版社的《王力語言學詞典》（1995：671）為準，節其「韻部」一條的精義：

在音韻學上，古音學家把古代韻文的押韻字加以歸類，每類就叫做一個韻部。後來又加上諧聲系統及異文等材料的分析歸納，和離析唐韻以及音理分析（審音），得出更為切合實際的漢語某一時代的韻部系統。韻部有時也用來指《切韻》系統的「韻」，如段玉裁說：《廣韻》206 韻，「依陸氏法言二百六部之舊」。實際上韻部就是「韻」，其所以稱為韻部，是對《廣韻》而言。從音值上說，只要是主要元音相同（有時甚至是音色近似）、韻尾相同（如果有韻尾）的話，就算同一韻部（含聲調的區別），與韻母必須同時要求韻頭也相同的標準不同。韻部雖然最初是一個對韻字分析歸類的術語，但是如果加上音值的擬測，也可以在漢語語音史的研究上使用。（按王力《漢語語音史》列有先秦、漢代……下迄明清

及現代方言的所有韻部及其音值。)

一般所謂上古韻部，據《王力語言學詞典》(1995：235)收有「古韻」一詞：

指上古漢語的韻部。古韻的韻部主要是根據以《詩經》為主的先秦韻文的用韻以及上古漢字的諧聲偏旁歸納總結出來的。一般也把兩漢韻部及先秦韻部合稱古韻。

詞典也列了兩張表：(1) 先秦韻部及擬音、(2) 兩漢韻部及擬音。兩者雖同為 29 部，但兩者是有些許差異的。例如先秦多了一個加括弧的「冬部」uŋ，搭配的陰聲幽 u，入聲覺 uk，並註明這個冬部是戰國時期分出的韻部。

董同龢(1968)《漢語音韻學》第十章「古韻分部」就是一部非常精要的先秦古韻分部的簡史，古韻分部異同的開展可以看出方法論的演進。王力(1937)〈古韻分部異同考〉也是古韻研究的經典。王力(1972)《漢語音韻》第六章「古音(下)」討論關於上古韻母系統的四個問題，替古韻分部作了很好的總結，四個問題是：

1. 為什麼各家韻部越分越多？
2. 為什麼陰陽兩分法和陰陽入三分法形成了兩大派別呢？
3. 如何對待上古聲調問題？
4. 諧聲偏旁和上古韻部的關係是怎樣的？

這四個問題之外，似乎可以加上第五個議題：

5. 諧聲偏旁和上古聲母的關係是怎樣的？

可惜王先生缺了(5)這一節，卻可以用董同龢(1968)第十二章「上古聲母」及董同龢(1944)上古音韻表稿敘論(一)聲母(頁11-44)來補足。雖然此無關乎古韻分部，但諧聲字對古聲母研究的貢獻幾乎可等同古韻分部對古韻母系統的價值。由此可見，古韻分部的依據以押韻和諧聲為主，對於韻部的定義及研究的深化，才是擬測的起點。如果把古韻部視為現代北方歌謠押韻的十三轍看待，就是沒有嚴肅對待音韻學的傳統。

六、北大中文系程悅〈從內證材料對《上古漢語：構擬新論》宵藥分部的考察與討論〉⁷一文的成果

2016年8月筆者出席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在安徽大學的2016高端學術研討會，以〈上古韻分布依據與元音構擬的原則——從何大安評白、沙《上古音新構擬》談起〉為題，做口頭報告，並獲得北京大學教授孫玉文的迴響，令其研究生作者程悅持其撰寫的上古音小組討論的成果（即本篇，並未在會上宣讀）相贈，個人如獲至寶，因與本篇論文主題一致。因此，將其摘要及重要論述略加引述，使本文討論內容更加豐富。首錄其中英文題目及中文摘要：

〈從內證材料對《上古漢語：構擬新論》宵藥分部的考察與討論〉

A Discussion Towards The Divisions of Traditional Xiao 宵 and Yao 藥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From An Aspect of Self-proof of Old Chinese*

本文利用上古內證材料，檢驗白一平和沙加爾《上古漢語：構擬新論》中的宵藥再分部（將宵部分為 *-aw / *ew，本文擬稱為宵 A / 宵 B，藥的部分為 *-awk / *-ewk，本文擬稱為藥 A / 藥 B）。本文將這種分部核之於《詩經》等先秦韻文及兩漢韻文、諧聲字、疊韻連綿詞等內證材料，發現宵 A 與宵 B、藥 A 與藥 B 兩部之間沒有截然的界線，若將傳統宵藥兩部按照《新論》的方式再各自一分为二，那麼會遇到這樣的困境：1. 在先秦乃至兩漢的韻文中，儘管宵 A 與宵 B、藥 A 與藥 B 各自有押韻的韻段，但是宵 B / 藥 B 部自押的韻段數往往少於或接近宵 A / 藥 A 合押的韻段數；2. 在諧聲上，宵 A 與宵 B、藥 A 與藥 B 雖然各自有不相通的諧聲偏旁，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諧聲偏旁；3. 在連綿詞

⁷ 本文思路是在北大中文系上古音小組對《上古漢語：構擬新論》的討論過程中形成的，參考了小組對該書的翻譯，並得到小組學友們的寶貴建議。孫玉文生悉心指導了本文的寫作，在此深表謝忱。文中如有錯誤，概由本文作者負責。作者案：此文已刊登於2018.1《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5卷1期，頁155-164。作者已對（2016）作了若干增減，但無礙於本文之引述。

上，有宵 A 與宵 B、藥 A 與藥 B 內部構成的疊韻連綿詞，但也存在不少 A、B 兩類字構成的疊韻連綿詞。綜合以上三點，本文認為，傳統的宵部、藥部內部不能再進行分部。

以下擇要介紹本文的成果。

（一）關於宵藥分部簡史，程文（2016）指出：

清代古音學者自江永開始分宵藥為二部，將宵部獨立出來，此後的研究者們基本承認並沿用這一分部的格局，到高本漢、王力、李方桂等學者，也沒有對宵部進行再分部。

白一平（1992）已經將宵藥進行了再分部，並利用統計法對分部進行了檢驗。該分部在海內外得到了少數學者的捧抬，被視為對上古音再分部的成功案例，具有一定影響，白一平和沙加爾 2014 論著《上古漢語：擬構新論》（以下簡稱《新論》），繼承白一平（1992）宵藥分部。不過，這一分析是否得當，還需要上古文獻進一步檢驗。

白一平（1992）的宵藥分部雖然經其統計法驗證，但其書也承認，統計法只是驗證假設的方法，不是用來分部的方法，而統計方法也不是檢驗上古漢語構擬的唯一方法。也就是說，統計法並不能用來分部。分部的問題，關鍵在於考察文獻，而具體採用哪一種方法，需要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方法的選擇不能必然保證結果的科學性——只有恰當地運用該方法才可能得出可靠的結論。白一平（1992）還認為，如果統計數據告訴我們分開的 A 部和 B 部在押韻上分開押韻的機率很小，也不能說明二部不能分開，可能是由於一些歸字上的問題而導致的。這實際上反應了對押韻材料的分析情況對統計法所得結果有深刻影響，對於上古文獻材料的考察與分析是考察分部的基礎。通過對上古文獻的考察，我們

認為宵藥再分部是不可靠的。

接著指出：宵部內可能存在有分別的兩類，董同龢（1944）已經提及。董氏《表稿》曾考定《廣韻》宵韻當有兩類不同的韻母，前者具有各種聲母的字，唇牙喉音韻圖置於四等，後者只有唇牙喉音，韻圖置於三等。從諧聲字看，他們也有一點不同。

繼《上古音韻表稿》之後，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1948）也提到宵部包含兩類音讀不同的字。經過董、白兩家的推波助瀾（董氏尚未提及宵部搭配的入聲），最後落實了白一沙《新論》宵、藥「再分部」（照鄭張的說法，分出的是韻母，不是分部）。

程文接著指出：

董氏根據《廣韻》宵韻存在重紐的事實，結合上古宵部在諧聲偏旁上出現的分別，推測宵部存在「確不能混」的兩類韻母，並認為這兩類的韻母的不同在於主要元音。其推測的依據基本是可靠的，但據此認為上古宵部存在兩類主要元音不同的韻部這一觀點，只是尚未經驗證的假設。

《新論》所構擬的上古音將傳統的宵藥兩部各分兩類，似乎已經將宵藥二分的假設證實了。他們將宵藥中的一類擬音為 *-aw/*-awk（以下擬稱宵 A、藥 A），另一類擬音為 *-ew/*-ewk（以下擬稱宵 B、藥 B）。

程文也注意到了陳新雄（2010[1999]：71-74）討論宵藥能否再分的文章，陳文針對的是余迺永（1985）《上古音系研究》而發。程文說明如下：

陳新雄（1999／2010）在批評余迺永《上古音系》將傳統宵部分為豪宵二部的做法時，對宵部再分引起諧聲與所分部之間的矛盾已有詳述，茲引如下：

余氏豪部（案，大致相當於《新論》*-aw 部及宵 A）的諧聲偏旁……不應見於四等韻。但「兆」聲確見於四等，平聲蕭韻「吐雕切」下有挑挑挑挑挑挑挑挑挑挑；「徒聊切」下有跳挑挑挑挑；上聲筱韻「吐了切」下有挑挑；「徒了切」下有窈挑挑挑挑；「苦皎切」下有挑；去聲嘯韻「他調切」下有挑挑挑挑挑挑挑；「徒吊切」下有挑；「刀」聲蕭韻「都聊切」下有貂刁刁刁刁刁刁刁；「徒聊切」下有迢髻芳豈砵；「勞」聲蕭韻有勞，「羔」聲蕭韻有羔；「交」聲上聲筱韻「古了切」下有皎皎皎皎；去聲嘯韻「鳥叫切」下有交，「梟」聲上聲筱韻「子了切」下有剝獠。

余氏宵部（案，大致相當於《新論》*-ew 部及宵 B）的諧聲偏旁……不應見於一等韻。但「奈」聲卻見於一等，平聲豪韻「魯刀切」下有簪；上聲皓韻「盧皓切」下有獠獠獠獠獠；去聲號韻「郎到切」下有潦；「堯」聲韻「奴巧切」下有撓。

程氏就諧聲的角度，做出「宵部二分並非截然」的論斷：

余氏所分豪宵二部大體與《新論》一致，以上所舉各例與宵部二分不符的諧聲情況，似乎不能一概以例外視之，而對此問題《新論》全無說明，更不給出諧聲字之範圍，未免過於簡略，就以上諧聲字之情況而言，宵部二分並非截然的。

程文（程悅 2018）在利用文獻進行考察檢驗之前，先從白氏二分的系統上進行觀察《新論》的分部分析，作成三個表。文繁不再細舉。

（二）從先秦韻文角度的考察

程文指出：

在傳統分部中，宵部自押 42 例，藥部自押 13 例，宵藥合押 11 例，宵幽

合韻 12 例。檢驗文獻的結果：以上自押與合押的情況可歸納為下表：

宵 A 自押	33	宵 A 宵 B	6
藥 A 自押	8	宵 A 幽 A	7
藥 A 宵 A	7	宵 B 幽 B	3
小計	48	宵 A 幽 A 幽 B	1
宵 B 自押	2	宵 B 侵	1
藥 B 自押	2	宵 A 宵 B 幽 B	1
宵 B 藥 B	1	藥 A 藥 B	1
小計	5	宵 A 藥 A 藥 B	2
		藥 B 覺	1
		藥 B 錫	1
合計	53		24

（三）先秦其他的韻文及兩漢韻文的考察

1. 先秦的其他韻文

先秦的其他韻文包括《楚辭》和《易》、《尚書》、《禮記》、《春秋左傳》、《國語》、《論語》、《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管子》、《墨子》、《呂氏春秋》等文獻中的韻文。統計結果如下：

宵 A 自押	9	宵 A 宵 B	6
藥 A 自押	1	藥 A 藥 B	2
宵 B 自押	4		
藥 B 自押	1		

以上宵 A 自押 9 例，宵 B 自押 4 例，宵 A 和宵 B 合押的例子有 6 例，宵 B 自押的韻段仍有少數合押的韻段。藥 A 自押 1 例，藥 A 和藥 B 合押 2 例。藥 A、藥 B 自押的韻段少於藥 A、B 合押的韻段。可見先秦其他韻文中，宵、藥的 AB 韻部間沒有分開的界線，更不必說他們

有再分部的可能。

2. 兩漢韻文的考察

統計結果如下：

西漢			
宵 A 自押	31	宵 A 宵 B	15
藥 A 自押	6		
宵 B 自押	1	藥 A 藥 B	5
藥 B 自押	3	宵 A 宵 B 藥 B	1

以上西漢宵部共 53 例，宵 A 自押 31 例，宵 B 自押 6 例，宵 A 宵 B 合押 15 例，宵 B 自押的韻段遠少於宵 A 宵 B 合押韻段。藥部共 9 例。藥 A 自押 1 例，藥 B 自押 3 例，藥 A 藥 B 合押有 5 例，比藥 A、藥 B 自押的韻段多。且有宵 A、宵 B 和藥 B 合押的情況。從西漢的情況看，宵 A 和宵 B、藥 A 和藥 B 很難說是分開的兩部。

原文還有一節：「從諧聲字和連綿字角度的考察」，由於作者指出《新論》字表所提供的材料不夠全面，檢驗過於繁瑣，我們就不再介紹。以下一段話可以認為作者對於諧聲字的深刻分析：

如果承認諧聲字分別諧聲的趨勢反映的是上古宵、藥部的二分，勢必要對以上宵、藥 A、B 兩部之間共用諧聲偏旁的事實進行解釋，也就不得不承認不同主元音的字之間可以大量共用諧聲偏旁。那麼，諧聲字之間的語音限制會被拓寬，諧聲字之間具有的語音共同性就會更加難以把握，隨之而來的困難就是判定一系列相互諧聲的字是否具有相同主元音。這種構擬實際上完全打破了「同諧聲者必同部」的歸字原則。

(四) 程文的結論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知：《新論》對宵藥部進行了再分部，導致韻文中合押韻段增多，打破同諧聲必同部的諧聲原則，使得一些疊韻連綿詞成為準疊韻連綿詞，同時也不能通過對分部來徹底解釋中古韻字的重紐對立，其再分部不但難以被文獻所證實，而且違背文獻所反映出來的事實。總而言之，從內證材料的角度來看，上古韻部宵藥內部不能再分部。

七、從上古漢語內證材料看白、沙對歌月元三部的再分部的再商榷

2018年12月出刊的《中國語言學》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刊出兩篇針對白一平、沙加爾上古音相關諸部再分類／分部的討論文章，分別是：

孫洪偉〈白一平微物文部歸字及再分類商榷〉頁1-14

齊曉燕〈從上古漢語內證材料看白一平、沙加爾對歌月元三部的再分部及構擬〉頁15-22

除了歸字外，相同的主題是：討論微物文三部或歌月元三部據元音構擬的再分類之可行性，兩文均充分利用上古漢語諧聲字、聯綿字、異文、讀若、同源詞等內證材料，指出白、沙的重新分類與構擬，均存在理論基礎站不住腳、分類缺乏內證支持，並且還會產生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在諧聲上，同一個聲符的字分別隸屬不同韻類（原屬同部），新擬的主元音相差很遠，比如發、撥主要元音分屬a、o，伐、筏主元音分屬a、o。違背「同諧聲必同部」的原則。同時發現重新分部之後的歌月元三部之間界線不分明，新的分部與構擬無法解釋先秦韻文的合韻材料。一個韻段內的韻腳字，主元音的發音部位相差甚遠，無法解釋《詩經》用韻的和諧。同時，將歌月元分為三類，無法解釋

疊韻聯綿詞，比如契(*-et) 闊(*-at) 主元音不同，將不再疊韻。同樣的情形，也無法解釋異文、讀若、同源詞的材料。因此《新論》對歌月元三部的再分部及其構擬值得商榷。

以上這些得不到漢語內證材料支持的例證，在兩篇文章中排比整齊，指證歷歷，足以作為白一平、沙加爾等以一部多音填空補位者參考，或者引發進一步的討論。

孫洪偉討論了白一平關於上古微文部的兩個處理：把部分前人一致認為是脂部的字歸到微部；把微物文三部再分為兩類。作者認為這兩個處理不能獲得上古漢語內證材料的支持。並且指出白氏處理不能成立的原因是（孫洪偉 2018：13）：

雖然《詩經》是上古押韻材料最豐富的文獻，但具體到某個部、某個聲旁的字，其入韻的數量往往是不足的，這會導致對這些材料的分析解釋有多種可能性，因此需要補充其他的先秦韻文，需要充分吸納諧聲字、通假異文和聯綿詞等材料，並對材料進行客觀的分析。白一平較少利用其他先秦韻文材料；對通假異文材料，只是在對自己結論有利的情況下才偶一用之；忽視諧聲原則，常隨意地拆分諧聲系列，以使例證合乎他的觀點。總之，缺乏對上古漢語內證材料充分客觀的分析，是他構擬不能成立的原因。

另外，這兩篇文章都看到白、沙系統所流露的過度人為拆分元音系統，以達到某種表格化的「平衡」、「勻稱」。因此，孫洪偉（2018：13）最後作了這樣的結論：

我們認為這兩個處理不能獲得上古漢語內證材料的支持。……白一平對前人意見的這兩處修訂，其實都基於他這樣的一種構想：讓傳統的脂質真、微物文、歌月元的韻部劃分跟收 -k 以及相配的陰聲韻、入聲韻的韻部劃分達到一種「對稱」「平衡」的局面。但正如孫玉文（2005：

127) 曾指出的：「從語言的普遍規律來說，世界上沒有完全對稱的、能把所有空檔都填滿的音系，各種語言的音系都處在對稱與不對稱的對立統一之中，借用孟子的話說，就是‘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八、從「韻部」的本質，看六元音系統的「假設」

王力（2000[1937]：59）〈上古韻母系統研究〉是這樣開始的：「上古韻部的研究，到了王念孫、江有誥以後，似乎沒有許多話可說了。上古的史料有限，我們從同樣的史料去尋求韻部，其結論必不會大相違異。但是，有時因為離析《唐韻》的方法未能盡量運用，有時又因為一二字發生輻輳而沒有把兩部分開，以致後人仍有商量的餘地。……所以我們雖承認王、江的造就已很可觀，但仍不能像夏忻那樣排斥顧、江、段、王、江以外的古韻學說為異說。」這段文字發人深省，也說明上古韻部的研究之歷久常新。

說到考古、審音兩派時，王力（2000[1937]：59-60）說：

所謂考古派，並非完全不知道審音；尤其是江有誥與章炳麟，他們的審音能力並不弱。不過他們著重在對上古史料作客觀的歸納，音理僅僅是幫助他們作解釋的。所謂審音派，也並非不知道考古；不過他們以等韻為出發點，往往靠等韻的理論來證明古音。戴氏說：「僕謂審音本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為斷。審音非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斷為合韻。」這可算是審音派的宣言。

王力早期（1937）對於古韻分部的結論是採取考古派一說，定古韻為二十三部（未含脂、微分部）。在《漢語史稿》（1957-1958）已把先秦古韻分為十一類廿九部。這是他晚年的主張，在《漢語音韻》（1972：175-177）裡他說：

陰陽兩分法和陰陽入三分法的根本分歧，是由於前者是純然依照先秦

韻文來作客觀的歸納，後者則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再按照語音系統進行判斷。這裡應該把韻部和韻母系統區分開來，韻部以能相互押韻為標準，……韻母系統則必須有它的系統性，所以研究古音的人，必須從語音的系統性著眼而不能專憑材料。具體來說，兩派之分其主要表現在職覺藥屋鐸錫六部是否獨立。這六部都是收 -k 的入聲字。如果併入了陰聲，我們怎樣瞭解陰聲呢？如果說陰聲之幽宵侯魚支六部既以元音收尾，又以清塞音 -k 收尾，顯然不是同性質的韻部，何不讓他們分開呢？……王力之所以放棄了早年的主張，採用了陰陽入三聲分立的說法，就是這個緣故。

斟酌於考古與審音之間，這是王力先生重視傳統分部並要總結古韻分部，提出古音系統的必要里程。他在〈先秦古韻擬測問題〉（2003[1964]：205）一文開宗明義以「韻部是不是韻攝」為標目，他說：

中國傳統音韻學從來不認為韻部等於韻攝。實際上韻部就是韻，其所以被稱為韻部，是對《廣韻》而言的。顧炎武以《廣韻》的魚虞模侯及麻之半合為一部，就意味著這些韻在先秦應該合為一個韻，元音只有一個[u]（其撮口呼為[y]）。所以他說「家」古音「姑」，「牙」古音「吾」，「茶」古音「除」，……「侯」古音「胡」，……等等，後人證明侯韻不屬魚部，「侯」古音「胡」之類是錯的。但是這個例子可以說明一個道理：古韻部無論相當於《廣韻》多少韻，也只能認為只有一個共同的元音。

「一部只有一個（共同）的主要元音」是王力對高本漢上古元音系統最大的修正。這也是六個元音系統的源頭，因為如高氏「把韻部擬測成韻攝，勢必造成上古漢語元音系統的極端複雜化。」是不合乎段氏「古音韻至諧」說（王力 2003[1964]：206），王力的指導原則是「古音擬測應該是一種示意圖，因此，上古元音只能是音位性質的描寫，不應該是實驗語音式的描寫。」（王力 2003[1964]：206）。

以下我們來看六元音系統何以成為新派上古音的最好選擇。新起的上古音構擬，近來標榜六元音系統，而且似乎很有共識，六元音之中，只有一個元音不同。試比較下列各家的不同：⁸

學者	元音數	主要元音	年度
王力	6	ə、o、a、e、ɔ、u	1978
包擬古	6	i、u、a、e、o、i	1980
白一平	6	i、u、a、e、o、i	1980/1992
斯塔羅斯金	6（對）	i、u、a、e、o、ə	1989
鄭張尚芳	6（對）	i、u、a、e、o、ɯ	1984/2003
藤堂明保	6	e、ə、o、u、ɔ、a	(1957)
白一平—沙加爾	6	i、u、a、e、o、ə	2014
李方桂	4	i、u、ə、a	1971
周法高	3	e、ə、a	1970
蒲立本	5（對）	i、e、a、o、u	1962-1963
蒲立本	2	ə、a	1977-1978

潘悟雲、馮蒸（2000：170-171）〈漢語音韻研究概述〉一文，有關「上古漢語元音系統」一節提及：

上古的韻部構擬到了蒲立本、李方桂和王力為一大變，在這以前音韻學家們認為，上古每一個韻部應該由不同元音的韻母組成，所以他們給上古漢語擬有很多的元音，高本漢擬有 15 個，董同龢擬有 20 個，如果不計元音的長短也有 14 個。這以後的音韻學家認為，互相押韻的各類韻母介音可以不同，但主要元音和韻尾必定相同，所以他們給每一個上古韻部只擬有一個主元音，這樣主元音的數目也就大大減少了。蒲立本（1962）擬有 5 個主元音，後來減為 2 個，李方桂（1971）擬有 4 個，

⁸ 林海鷹（2006：8-9）《斯塔羅斯金與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統比較研究》（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本表為節縮取樣。

王力(1978)、包擬古(1980)、鄭張尚芳(1984)擬有6個。

從這段說明可以理解，最先把主元音簡化為五個者為蒲立本，王力較早的構擬，如《漢語史稿》(1957-1958)，就單元音而言，也是五個，即 ə、o、a、ɑ、e，因為他擬了四類複元音(幽、宵類作 əu，au；脂微二類作 ei、əi；-i，-u 祇作韻尾，因此不計入主元音)。1978 年王力發表《同源字典》做了調整，魚部由 ɑ→a，歌部由 a 改 ai，取消 ɑ、a 之對立，幽、宵兩類改單元音，幽部作 u，宵部作 ô (即 ɔ)，而脂、微、歌均為收 -i 之複元音 (ei、əi、ai)，-i 僅作韻尾，不佔元音之音位，就形成六元音系統：

		u
e	ə	o
		ô
a		

所以六元音的系統，王力 1978 年定案(《同源字典》)的擬測是各家最早出現的。其後主要四家(包擬古一白一平、鄭張尚芳、斯塔羅斯金、白一平—沙加爾)比較巧合的是主要元音有五個相同，僅有 ə-i-u 一套對應，其代表唯一的央元音，各有所據。包擬古(1980)⁹提出其元音系統有以下說明：

我的標音在許多方面是跟李方桂一致的，而且所依據的假設也相似。只是我的構擬在時代上比他早，所以互相之間存在許多不同點。他的元音系統包括四個主元音和三個複合元音；而我的系統則有六個主元音，三個高的三個低的，這兩個系統比較如下：

⁹ 根據潘悟雲、馮蒸譯，1995 年，頁 59。

表 3 上古漢語的元音系統

李方桂			包擬古		
i	u		i	i	u
ə		iə	e	a	o
a	ia	ua			

我的元音系統最初是在 1971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Baxter 的博士論文（1977）也採用了這個基本系統，不過在有幾個方面作過修改。本文欣然接受了這些修改意見。

包擬古 (N.C. Bodman 1995) 在其論文集《原始漢語與漢藏語》漢譯本自序提及：他 1945-1950 年在耶魯大學就讀時，漢語主要導師有三位：金守拙 (G.A. Kennedy)、羅常培和李方桂。羅 1946-1947 期間於耶魯講學兩年，並曾與李方桂、趙元任合譯高本漢名著《中國音韻學研究》。包氏的博士論文《〈釋名〉的語言學研究：聲母和聲母複輔音》就是羅常培給他的題目。¹⁰《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中譯本 2003，頁 56）也提及 1948-1949 年在耶魯大學任教，他說：「我教了一些非常優秀的學生。尼古拉·博得曼 (Nicholas Bodman) 就是我當時在耶魯大學教的第一個學生。」

白一平 (Willian H. Baxter) 1977 年自康乃爾獲得博士學位，題目是〈從漢字多音異讀探討中古重紐對立的上古來源〉（暫譯），採用的就是包擬古—白一平的共同系統，這個系統沿用到 1992 年出版的《上古音手冊》，首先獲得沙加爾 (Sagart 1993) 書評的讚賞，也指出其形態構擬之不足。他們由觀點的切磋，進而合作寫出幾篇文章 (2009、2012) 之後，終於形成「白一平—沙加爾」體系。本書既名「新構擬」，韻部未有更張，主要表現在音節型態上，包括大量的詞綴及聲母輔音、複輔音的構擬。本文不擬評論。至於六元音的系統，基本上承襲 Baxter (1992)，卻意外的更動了「包—白」體系中

¹⁰ 個人曾於 1977 年秋—1978 年夏因錄取政府公費留考在康乃爾大學語言學系入學當研究生，並修習包擬古教授兩學期三門課，包括漢語音韻史、漢藏語研究及比較閩南語。印象深刻的是在他的研究室上課，研究室門上掛有一幅羅常培半身肖像，十分英挺，可見其尊師重道之一斑。

的 [i] 之音改從 [ə]，¹¹ 這樣就與斯塔羅斯金取得一致，這一來，所謂新起的三大體系，祇有鄭張尚芳—潘悟雲的體系仍用 *u* 來表示，顯得孤立。

六元音系統成為新派的共識，主要表現在拋開傳統韻部的束縛，即一部不限於一個主元音，重新找回《切韻》分類的投影，推進漢藏語比較與構擬，建立在無數個假設當理據。其中「假設」似乎是新派上古音系的基礎，白一平（1994）〈關於上古音的四個假設〉一文，開宗明義指出：

擬測上古漢語的語音系統是一個逐漸的過程。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不同的假設。有的假設已經為很多人所接受。比方說，現在很多人都同意，中古音的二等韻母是從有介音 **-r-* 的音節來的。本文討論的是四個還有爭論的假設。既然學者們對它們還沒有一致的看法，所以我覺得很值得討論。……我給這四個假設起了下面的名字：

1. **rj* 假設
2. 圓唇元音假設
3. 前元音假設
4. 清塞音假設

四個假設中，1 屬介音，2、3 屬元音，4 屬韻尾。由於本論文由古韻部與元音問題切入，所以此處略過 1、4 兩項，直接切入 2、3 兩假設。以下引文依作者敘述方式，先說「前元音假設」。白氏說：

我擬的主要元音跟李先生的不太一樣，我認為上古音有六個主要元音：

¹¹ 白一沙 (Baxter & Sagart 2014 : 50) 針對韻部 (Rhymes) 說明：「雖然韻部構擬在個別詞有些更動，我們找不出理由要修改我 1992 年的設定，但有兩項例外：一為寫 **ə* 替代 1992 年的 **i*，更重要一點，我們認同斯塔羅斯金 (1989) 構擬韻尾 **-r*，對比於 **-j* 和 **-n* 兩韻尾，也找到許多證據。」

- (3) *i *i *u
 *e *o
 *a

這樣，有兩個前元音 *i 和 *e；有兩個圓唇的後元音 *u 和 *o；還有兩個展唇的央元音，一個高的 *i 和一個低的 *a。

有前元音的音節，如果沒有介音，就變成中古音的四等音節：

- (4) 堅 jiān < ken (先) < *kin (李 *kin)
 肩 jiān < ken (先) < *ken (李 *kian)

這就是「前元音假設」的主要內容。

例(4)前後說明太簡單，不易理解為何要這樣假設，因為李方桂的擬音上古主元音有別，一個是 i，一個是 a，他仍不滿意，他認為兩個前元音正好用來區別這兩個中古同音字（同屬中古先韻古賢切）的上古來源不同，所以有此「假設」。根據白一平後文的說明，此假設原針對高本漢構擬之中、上古音三四等有介音 -j- 與 -i- 之別而發，例見(27)：

- (27) III 彥 yàn < ngjenH (緣三)；高本漢 ngiän- < *ngian / 李 *ngjianh
 IV 硯 yàn < ngenH (霰)；高本漢 ngien- < *ngian / 李 *ngianh

但是高本漢的四等介音很可疑，它在中古音裡沒有辨義作用；而且，《切韻》裡四等韻母的分布跟一等韻母的分布一樣，就是說，四等韻母之前可出現的聲母與一等韻母之前能出現的聲母完全一樣。黃侃早就注意到這一點，所以他說一等韻和四等韻是「古本韻」。這樣，好像最好是說《切韻》時代的四等韻母根本沒有前介音，而有前的主要元音 -e-。

如果中古音沒有高本漢的「強的元音性的介音」-i-，那他的上古音裡的介音 *-i- 也就更可疑了。「前元音假設」的主要內容是說，上古音沒有這個介音；中古音的四等韻母是來自上古音裡有前元音的韻母：

(同前例(4))

這樣，如果一個傳統的韻部裡有一等韻母和四等韻母的區別，要擬測兩個不同的主要元音，例如元部又有一等的寒韻，又有四等的先韻，所以元部裡至少要擬央元音的 *-an 和前元音的 *-en：

(29) I 乾 gān < kan (寒) < *kan (高 kân < *kân / 李 *kan)

IV 肩 jiān < ken (先) < *ken (高 kien < *kian / 李 *kian)

這樣擬元部可以解決上古音的一些棘手的問題。例如元部有三個不同的三等韻母：

(30) 飯 fàn < bjonH (願) < *bjans (高 *b^hiwan / 李 *bjanh)

弁 biàn < bjenH (線三) < *brjans < *brjwans < *brjons

(高 *b^hian / 李 *bjianh)

便 biàn < bjienH (線四) < *bjens (高 *b^hian / 李 *bjianh)

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裡只有兩個韻母 *-jan 和 *-jian，相當於中古音的三個韻母。他只好把重紐三等的「弁」和重紐四等的「便」，寫成一樣。白氏認為如果承認元部裡又有央元音又有前元音，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白一平 1994：51-52)

以下看「圓唇元音假設」。白氏說：

圓唇元音假設的主要內容是說，中古音的合口介音 -w- 有一部分是從圓唇的主要元音 *u 或 *o 來的，其他的都是從圓唇聲母 *k^w- 等來的。這樣可以解釋中古音的合口介音的分布。中古音的合口韻母有一大部分不能

在舌齒音聲母之後出現。……不過，還有一部分合口韻母可以在舌齒音聲母之後出現。這種音節雅洪托夫（Jaxontov）說本來有圓唇的主要元音 *u 或 *o，後來，主要元音分裂成 *wi 或 *wa：

(20) 敦 dūn < twon (魂) < *twin < *tun

端 duān < twan (寒) < *ton

說 shuō < sywet (薛) < *hljwat < *hljot

白氏經過一段論證落實了他自己的「假設」：

李先生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假設：他說，「上古同一個韻部的字一定只有一種主要元音」（1971：20）。我很贊成他這個假設。而如果用清代學者所擬定的韻部，圓唇元音假設確實有問題。比方說，按照圓唇元音假設，文部的一部分字要擬測展唇的 *-in，還有一部分要擬測圓唇的 *-un，而 *-in 跟 *-un 有不同的主要元音，不應該相押。

我本來接受李先生的說法，認為雅洪托夫的圓唇元音到了《詩經》的時代已經變成複合元音了，這樣說就避免跟傳統韻部發生衝突。不過，我自己研究《詩經》的韻文的時候就發現，圓唇元音和展唇元音相押的例子實在不多，多半不超過清代學者的韻部之間的接觸。我也採用了概率論的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詩經》韻文裡圓唇元音和展唇元音相押的例子那麼少，可能不可能是偶然的現象？結果是，這個可能性非常小。這個問題很複雜；我的書裡說得相當詳細，但我現在只能舉幾個例子。

文部的情形特別清楚。我按照圓唇元音假設，把《詩經》的文部韻字分成 *-in 部和 *-un 部，在附錄裡列出。結果是，*-in 和 *-un 相押好像只有一次，即《大雅·鳧鷖》第五章（248.5）……：

(21) 《大雅·鳧鷖》(248.5):「公尸來止熏熏」(跟 *-in 押韻)

《大雅·雲漢》(258.5):「憂心如熏」(跟 *-un 押韻)

這個說法在本文第四節之(二)評白一沙的韻母系統與元音的搭配一節曾加引用，針對「一部多音」的質疑，筆者自作解人，以為 *-in 和 *-un 相押好像只有一次的特例，似乎局部回應了文部元音可以二分之理由。但據本文第七節所引孫洪偉(2018)，指出其歸字多與前人相左，重新檢視統計其所分二類獨用、合用之次數，大異其趣。例如孫氏指出白氏的文部兩類合用 4 次，認定標準已不相同，孫氏指出：「「熏」字《詩經》入韻兩次，一次與 u 類相押(258.5)，一次與 i (ə) 類相押(248.5)，白氏說兩處的「熏」詞義不同，所以可能有 u 類和 ə 類兩讀，這也只是猜測，我們仍處理為一讀。」又說：「即使按照白氏的處理意見，排除他隨意拆分諧聲系列的例子，每個部都有相當數量的例外，微部兩類合用相對較少，但最常見的「歸」字的歸類又有疑問，因此都不足以將二者截然分開。」由此可見白氏的四個「假說」只是整合前賢不同的「假說」，放到一個蔓筐，並嘗試以機率的外在測試自圓其說，攤在以內證材料為主體的驗證之前，卻往往諸多扞格，這與他的治學嚴謹程度有關。可見白一沙系的一部多音說，距離真實的古音真象，恐怕不可能一步就到位的。

九、結論

以上從多個角度觀察新派上古音如何形成六個元音的共識。其主要表現在拋開傳統 30 (或 22) 部的束縛，大膽主張一部不限於一個主要元音，重新找回切韻分類的投影，或堅持重紐對立必有上古的區別，或推進漢藏語比較與構擬，或發展上古漢語的形態，擴充詞綴的運用，或吸納方言 (尤其閩方言與孝義方言的另類存古)，或採納聲調起源或元音長短之「假說」，或建立自己的四個假說 (白一沙系統之根基)。似乎看到上古音系研究已形成新顯學，它是未來漢藏語研究全面發展的契機，但是由於問題過於複雜，導致很少人能著手研究，進行深度批判，也將成為前進的絆腳石。

由於本文的初步探索，本人也察覺到構擬上古元音體系，本來就可能尙停留在沙盤推演的階段，形成音位化的音類排比填空，或許這也是推演的一小步。我們期待深化漢語內部構擬，嚴格進行漢藏同源詞的對應研究，去蕪存菁，必能找到新共識，把「假設」變成語言事實，可能還要經過漫長的拔河。

引用文獻

- 丁邦新，1994，〈漢語上古音的元音問題〉，收入李壬癸、黃居仁、湯志真編《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二輯·歷史語言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21-36。又收入氏著《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年），頁 42-63。
- 王 力，1957-1958，《漢語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
- 王 力，1972，《漢語音韻》，香港：商務印書館。又出版於 1989 年，香港：中華書局。
- 王 力，1978，《同源字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王 力，1988，《王力文集》（第九卷·漢語史稿），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王 力，1995，《王力語言學詞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王 力，2000，〈上古韻母系統研究〉，收入氏著《王力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59-129。原刊於《清華學報》12.3：473-539，1937 年。
- 王 力，2003，〈先秦古韻擬測問題〉，收入氏著《王力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204-242。原刊於《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64.5：41-62，1964 年。
- 余迺永，1985，《上古音系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又出版於 1980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方桂，王啓龍、鄧小詠譯，2003，《李方桂先生口述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林海鷹，2006，《斯塔羅斯金與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統比較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博士論文。又出版於 2015 年，《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八編·第 13 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 金理新，2002，《上古漢語音系》，合肥：黃山書社。
- 金理新，2013，《上古音略》，合肥：黃山書社。
- 俞 敏，1999，〈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收入氏著《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62。原刊於 1979 年。

- 姚榮松，2010，〈台灣閩南語歌仔冊鄉土題材之押韻與用字分析〉，《台灣學誌》1：143-204。
- 孫洪偉，2018，〈白一平微物文部歸字及再分類商榷〉，《中國語言學》9：1-14。
- 馬毛朋，2007，〈十三轍、民謠用韻與上古漢語韻部元音構擬的原則〉，《中國語文通訊》81/82：104-112。
- 郭錫良，2010，《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新雄，1969，《古音學發微》。又出版於1972年，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 陳新雄，2008，〈鄭張尚芳《〈詩經〉的古音學價值》述評〉，《中國語言學》1：11-14。
- 陳新雄，2010，〈宵藥二部古韻尚能細分嗎？〉，收入氏著《陳新雄語言學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頁71-74。原刊於《紀念許世瑛先生九十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999年），頁141-151。
- 程悅，2018，〈基於內證材料對《上古漢語：構擬新論》宵藥分部的考察與討論〉，《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5.1：155-164。
- 董同龢，1944，《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21），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又出版於1975年，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第三版）。
- 董同龢，1948，〈廣韻重紐試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3：1-20，收入丁邦新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74年），頁13-32。
- 董同龢，1968，《漢語音韻學》，臺北：廣文書局。又出版於2001年，北京：中華書局。
- 齊曉燕，2018，〈從上古漢語內證材料看白一平、沙加爾對歌月元三部的再分部及構擬〉，《中國語言學》9：15-22。
- 潘悟雲，2000，《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潘悟雲、馮蒸，2000，〈漢語音韻研究概述〉，收入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

- 語同源詞研究(一):漢藏語研究的歷史回顧》(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頁 117-308。
- 潘悟雲編,2010,《境外漢語音韻學論文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鄭張尚芳,1984,〈上古音構擬小議〉,收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論叢編委會編《語言學論叢》(第1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36-49。
- 鄭張尚芳,1987,〈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溫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7.4: 67-90,收入氏著《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 348-387。
- 鄭張尚芳,1995,〈上古漢語聲母系統〉,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四屆年會暨第七屆北美漢語語言學會議(ICCL-4/NACCL-7)宣讀論文,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收入氏著《鄭張尚芳語言學論文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 399-414。
- 鄭張尚芳,2003,《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鄭張尚芳,2013,《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鄭張尚芳,2015,〈謹謝伯元先生質詢〉,收入《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 103-115。
- 龔煌城,2002,〈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收入《上古音專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頁 1-29。
- 〔法〕沙加爾,龔群虎譯,2004,《上古漢語詞根》,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俄〕斯·阿·斯塔羅斯金,1989,林海鷹、王沖譯,鄭張尚芳、馮蒸審校,2010,《古代漢語音系的構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又譯作《古漢語音系的構擬》,張興亞譯,唐作藩審定,2012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美〕包擬古,潘悟雲、馮蒸譯,1995,《原始漢語與漢藏語》,北京:中華書局。
- 〔美〕白一平,1994,〈關於上古音的四個假設〉,收入李壬癸、黃居仁、湯志真編《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二輯·歷史語言學)(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41-60。又收入潘悟雲編《境外漢語音韻學論文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 247-265。
- 藤堂明保,1957,《中國語音韻論》,東京:江南書院。

- Baxter, William H. 1977. "Old Chines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hongniu Doublets: A study Using Multiple Character Readings."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 Dah-an. 2016. "Such Errors Could Have Been Avoided——Review of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By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4.1: 175-230.
- Pulleyblank, E.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Part II." *Asia Major* (New Series) 9.2: 206-265.
- Pulleyblank, E.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ew Series) 9.1: 58-144.
- Sagart, Laurent. 1993. "New Views on Old Chinese Phonology." *Diachronica* 10.2: 237-260.
- Sagart, Laurent.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Schuessler, Axel. 2007. *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Yakhontov, S. E. 1965. *Drevne-Kitajskij jazyk*. Moscow: Izdatel'stvo 'Nauka'.

參考文獻

- 丁邦新，1979，〈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0.4：717-739，收入氏著《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2-32。
- 丁邦新，1987，〈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補證〉，《國文學報》16：59-66，收入氏著《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33-41。
- 王 力，1937，〈古韻分部異同考〉，收入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編《語言與文學》

- (上海：中華書局)，頁 51-77。又收入氏著《王力文集》(第 17 卷·音韻通論·上古音)(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97-115。
- 王 顯，2011，《詩經韻譜》，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壬癸，1989，〈閩南語喉塞音尾性質的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0.3：487-492。
- 李方桂，1956，〈武鳴土歌〉，《中央研究院院刊》3：215-222。
- 俞 敏，1984，〈後漢三國梵漢對音譜〉，《中國語文學論文選》，東京：光生館。
- 張洵如，1956，《北平音系小轍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
- 陸志韋，1947，《古音說略》，北平：哈佛燕京學社。
- 楊懷源，2014，《兩周金文用韻考》，北京：人民出版社。
- 趙曉陽，2006，《舊京歌謠》，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龔煌城，2005，〈原始漢藏語的韻母系統〉，收入李葆嘉主譯，王士元主編《漢語的祖先》(北京：中華書局)，頁 152-220。
- 〔美〕白一平，2005，〈親緣性強於偶然性：古漢語與藏緬語的機率比較〉，收入李葆嘉主譯，王士元主編《漢語的祖先》(北京：中華書局)，頁 152-220。
- 〔蘇聯〕謝·葉·雅洪托夫，葉蜚聲、陳重業、楊劍橋譯，唐作藩、胡雙寶選編，1986，《漢語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yaorongsong@gmail.com

The Definition of and the Evidence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Rhyme Groups of Old Chinese ——A Discussion on the Principles of Reconstruction of Vowels

*Yao, Rong-s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rifies whether the rhyme groups of Old Chinese are equivalent to the *She* rhyme groups (韻攝) or the *Shisan zhe* thirteen rhymes (十三轍) found in traditional vocal performing arts in North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article discusses publications published from 1989 onwards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six-vowel system of Old Chinese. These works divide the traditional 22-31 rhyme group into two or three groups, giving 53-58 types of finals, and offer well-structured tables of final combinations consist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final codas and six vowels. These reconstructions break the ‘one rhyme group with one vowel’ proposal of Wang Li and Li Fang-Kuei, which was decided upon on the basis of *Shijing* rhyming and the phonetic serie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eight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examines Ho Dahan’s (2016) review of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by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as well as Pan Wuyun’s (2010)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reconstructions of Old Chinese. It is then followed by examining Gong Hwang-cherng’s (2002) critique of the vowel reconstruction proposed by Pan Wuyun and Feng Zheng as well as Chen Hsin-hsiung’s questioning

*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of the six vowels and 58 rhyme groups proposed by Zhengzhang Shangfang and Zhengzhang's reply to Chen. Afterwards,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definition of Old Chinese rhyme groups and the universal orthodox lineage of poetry rhym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rrors identified by Ho Dah-an in Baxter and Sagart's new publication. Subsequently, the article returns to Wang Li's defini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Chinese rhyme groups' and to the tradition of phonology that advocates the balance between rhyming and *xiesheng* (諧聲). The last two sections, 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amongst the Old Chinese Research Group at Beijing University on Baxter and Sagart's 'new reconstruction' as well as Cheng Yue et al.'s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evidence, presents the results that the groups xiao-yao, wei-wen-wu and ge-yue-yuan are inseparable. Finally, the article provides theoretical evidence for the six-vowel consensus of different school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Baxter's compiling and organizing of the work of previous scholars has brought constructive contributions but his proposal is not necessarily conclusive as it has not yet satisfied all doubts among scholars.

Keywords: Old Chinese phonology, rhyme groups, the *Shisan zhe* thirteen rhymes, the six-vowel system, one rhyme group with many vowels, division of the group *xiao-yao*